

人生借鉴译丛

Fünfziger

五十知天命 名人

[德] 格哈德·普劳泽 著

《时代》周刊著名专栏作家真诚奉献！

中华书局

「人生借鉴译丛」

Fünfziger

五十知天命

爱因斯坦五十岁时有什么样的惊喜？居里夫人的奖金哪里去了？五十岁的康德已取得了哪些成就？

亲爱的读者，不管你是男是女，不管你年龄几何，都将在这些表达和描述里发现自己，找到自己的问题和境况。因为从根本上说几乎一切都已经被其他人经历过，遭受过，期待过，畏惧过。

著名的《时代》周刊《谈天说地》专栏主笔格哈德·普劳泽对这一类问题作了探讨，在讲述的过程中尽量让名人自己来谈体会，而且尽可能详尽。

ISBN 7-101-04370-4



9 787101 043709 >

定价：14.00 元

责任编辑：王瑞玲
封面设计：毛 焯

《人生借鉴译丛》

孔德明 印芝虹 主编

五十知天命

[德] 格哈德·普劳泽 著

[德] 曼弗雷德·B. 梨木若特 图

陈 兆 译

印芝虹 校

中 华 书 局

**Fünfziger.Ein Geschenk für alle zwischen 50 und 60 by
Gerhard Prause**

Copyright © 1983 by Gustav Lübbe Verlag GmbH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京图字:01-2002-332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十知天命/(德)普劳泽著;陈兆译.-北京:中华书局,
2005

ISBN 7-101-04370-4

I.五… II.①普…②陈… III.人生哲学-通俗读物
IV.K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8348 号

书 名 五十知天命

丛 书 名 人生借鉴译丛

著 者 [德] 格哈德·普劳泽 [德] 曼弗雷德·B. 梨木若特 图

译 者 陈 兆

责任编辑 王瑞玲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5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87×960 毫米 1/32

印张 6³/₄ 字数 79 千字

印 数 1-5000

国际书号 ISBN 7-101-04370-4/I·577

定 价 14.00 元

前 言

小的时候,人们渴望自己尽快成长,以便早日长大成人。但长大后,即便才二十多岁,大部分人就想推迟年龄增长以及后来成为老人的过程。没有人愿意在二十六岁时就被算作三十岁的人,即使到了二十九岁也还是不愿意;但在十年之后,也就是三十九岁的时候,大家却愿意说自己仍属而立之年。这种情况发生在所有的年龄段,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岁的人同样如此。

可见数字会对人产生一种很大的心理影响,几乎没有人可以逃脱。尤其是生命年轮中的整岁数,它们让人感觉是一个跳跃,一个深刻的变化,但同时也给人以欣慰,庆幸自己毕竟达到了这个年龄,因为这并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情。逢十的整生日给人们提供了契机,去感激和总结,去回顾过去十年,也去展望未来十年,去祝福自己以及享受别人的祝福。庆祝生日是一个古老而又美丽的习俗。

“人生借鉴译丛”向大家讲述古往今来著名的或人们所熟知的人物在某个年龄段的种种境况遭遇:他们的生日是如何度过的?他们生理心理状态如何?经历过什么?有何规划以及有何行动?他们曾有过什么样的困惑?他们是否幸福?对未来还有着信仰,还是早已灰心断念?在讲述的过程中尽量做到让名人自己来谈体会,而且尽可能详尽,为此我引用了他们的信件、日记或自传里的一些文字。因为他们自己的表述最能说明他们期待什么,他们担忧什么或者他们为什么而高兴。

亲爱的读者,不管你是男是女,不管你年岁几何,都将在这些表达和描述里发现自己,找到自己的问题和境况。因为从根本上说几乎一切都被其他人经历过、遭受过、期待过、畏惧过,包括衰老这惟一能够延长生命的现象。同

时，以整个生命长河为背景来观察某个特定的年龄段，人们会不断地认识到许多意想不到的东西。比如，只有在这种时候人们才会明白——这对于某些人来说可能是一种安慰——即使伟人、名人和成功人士也会一次次陷入茫然无助，甚至绝望的境地。然而，读者看见，生活又继续前行了，并且往往就在这时，柳暗花明又一村，幸福迎面走来。

格哈德·普劳泽



伊曼努尔·康德

Immanuel Kant

1724—1804

“您为什么沉默——在
这个时代，这个崭新的时
代——不发出自己的声音？
沉睡了吗？……”

事业蒸蒸日上

——康德

伊曼努尔·康德：德国哲学家，
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创始人。著
有《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
判》等。

一个二十岁的人也可能已经经历了他生命的一半或者更多；他只是不知道而已。五十岁的人（排除少数的例外情况）已经走过了他们生命的一半，并且他们也都知道这一点！然而，一旦人们意识到生命的前半部分——无论它是美好充实还是劳累沮丧——已经不可挽回地过去了，自己已经踏上了后半生的旅途，而这后半生在很多方面也不再会有什么影响时，年过五十就常常会被视为结束的开始：从现在起就要走下坡路了。

在我们的曾祖父时代，对人类的各个生活阶段就已经有了一个发人深思的、深受大家喜

爱的画面象征,正如雅各布·格林,日耳曼文学家和童话收集者在《年龄谈》中写到的:“在我父母房间的墙上挂着这样一幅毫无艺术价值的画,但它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在第一级台阶上放着一个摇篮,只能看到孩子的头探出摇篮向外张望。在第二级台阶上站着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手拉着手,相互微笑着;第三级台阶上是一对少男少女,虽然相互挽着胳膊,但是每个人都看着各自的前方。在中间第四级台阶上是一对青年男女,即新郎新娘,俩人分开站立着,新郎手中拿着礼帽站在新娘前面,而她则微微鞠躬。在第五级台阶上男人和女人走下来,俩人随意地牵着手;第六级台阶上是一对上了年纪的男女,还互相挽着手臂,已经有一些佝偻;在第七级台阶上一对白发苍苍的老人最终又回到地面,每人拄一根拐杖,扶持着前行,在他们行进的前方一座墓室正在打开……”

对于年过五十的人来说,这种以十为单位的划分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比如现在人们不说“五十岁晚年将至”,而代之以“五十岁行运”,

那就意味着五十岁还没有开始走下坡路。但是古罗马人早就意识到有一点是肯定的：五十岁开始步入老年。这一源自古罗马的观点很长时间内占据了人们的思想，直至近现代，随着人的平均寿命明显地提高。当柯尼斯堡的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庆祝他的五十岁生日时，致辞人称呼他为“德高望重的老人”。

康德，这位被称为“德高望重的老人”在当时，1774年，正致力于撰写他的主要著作《纯粹理性批判》。四年前他被柯尼斯堡大学任命为形而上学和逻辑学的教授，这以后他没有再发表任何作品。比康德年轻十七岁，出生于瑞士的哲学神学作家约翰·卡斯帕尔·拉瓦特尔，和康德、赫德尔、歌德都是朋友。他在给五十岁的康德的一封信中写道：

“世界对您来说已经不复存在了吗？为什么那么多不会写的人在写，而您，能写出如此优秀著作的人却停止了？您为什么沉默——在这个时代，这个崭新的时代——不发出自己的声音？沉睡了吗？康德——不，我不想赞美您——

但是请您告诉我，您为什么沉默？或者再进一步，请您告诉我，您要发言。”但是康德沉默着。甚至在书信中——他是一个拖拉的写信人，总是用一长串的道歉来开始他的信件，因为他回信总是太迟——也只是暗示他在作他的伟大工程。正是在这一工程中，他告别了所有迄今适用的哲学，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出发点。经过了10年的思考，最终，在1781年的复活节，他的856页的巨著《纯粹理性批判》出版了。康德当时五十七岁，热切地等待着反响。但是他的等待是徒劳的。他的思想对同行们来说是如此的陌生，以至于他们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理解并接受它。

年过五十的康德无论如何都没有在走下坡路，他也没有停滞不前，相反，他的事业蒸蒸日上，蓬勃发展。此后，他又出版和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书籍和论文，直到他在即将八十岁时离开人世。而也就是在他生命终结的前几个月，他才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患病。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康德的身体状况一直良好。他并不是所谓的身体强壮，相反，他总担心

自己会染上种种疾病。他羸弱的体质使他产生这种担忧，于是他强迫自己的生活遵循一系列死板的健康规则。这并不是是一种怪癖。身高只有157cm的康德有一个异常狭小的胸腔，他一生都得忍受呼吸困难的折磨，还常常感到胸闷。为此他坚信，只有严格地遵守他的一系列规则才可能度过难关。这一套程序是这样的：

他每天不多不少7小时睡眠。早上5点叫醒。然后工作到大约13点，不是在家里就是在大学里。在大学里他要给学生上课，他的课一次也没有停过。稍过13点开始午餐（由他的仆人安排好），他总会邀请客人共进午餐。下午的时间用来冥想。每天晚上7点整，康德准时开始散步。他散步时总是一个人，而且有他的理由：在走路时他不想说话，也就是说不想张开嘴巴。因为他担心一旦开口就会遭受“风湿性病菌”袭击。他也不想让自己的速度去配合他人的步子，这可能使自己大汗淋漓。晚上10点钟——从不晚点——他上床睡觉。



腓特烈二世

Friedrich II

1712—1786

“我们完全可以简单一些、适度一些生活——但是，如果人们能够享受这些生存的诱惑，又何故放弃呢？……”

享乐主义者

——腓特烈二世

腓特烈二世：又称腓特烈大帝，普鲁士第三代国王(1740—1786)。在摧毁神圣罗马帝国和领导统一德意志方面起过重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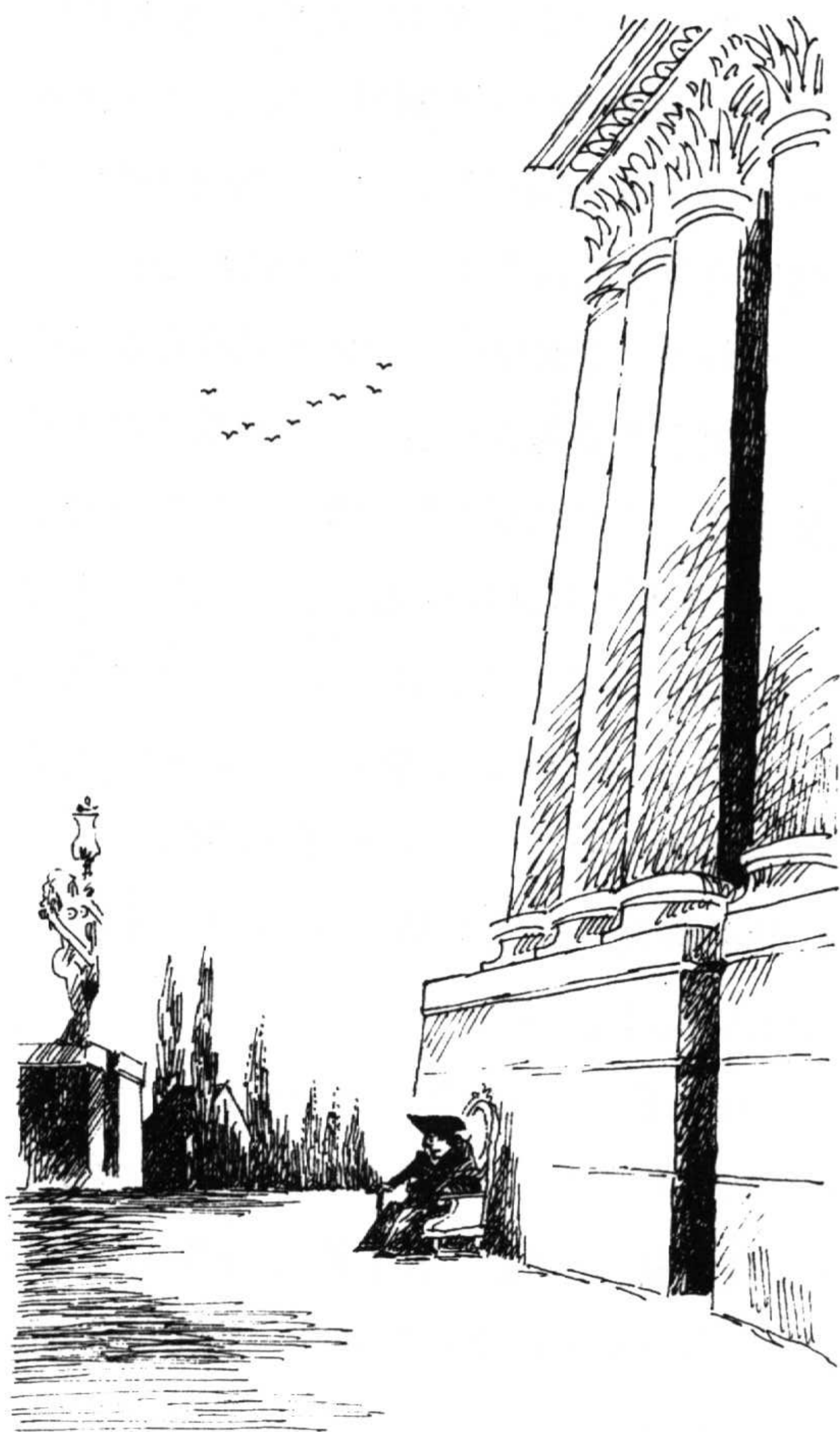
腓特烈二世，普鲁士国王，生于1712年1月24日。在他五十岁时，他自己和他的国家正处于危难之中。6年来他与一个超强的敌人，即由众多的欧洲大陆列强结成的盟军作战，遭遇了越来越多、越来越惨重的失败(他作为统帅的灾难性失误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当时腓特烈二世已经确信无疑：“这所有的一切都将毁灭”，“我们再赢一两场战争的胜利又有什么用呢，最终我们还是会被别人打败的”。长时间以来他就已经想着自杀，而且随身带着毒药。对此，他写道：“我将会随着我的祖国的消亡而死亡。”然而，1762年1月俄国女皇伊丽莎白逝

世。她的继承人，荷尔斯坦因哥德鲁家族的彼得三世，娶了叶卡捷琳娜·冯·安哈特-采布斯特（在历史上被称为叶卡捷琳娜二世），并与他真心敬重的普鲁士国王签定了特殊和约，从而将腓特烈二世和普鲁士挽救于危难之中。

腓特烈二世对这一连串幸运简直难以置信。当时五十岁的他在给三十四岁幼稚的彼得的感谢信中极尽热烈之辞：“我们正处于万分艰难之中，我差不多对我的状况完全绝望了。但是现在，我找到了一个忠实的朋友……假如我不是个基督徒，我会为陛下您建造庙宇和祭台，就像为神建造一样……至于我，我的身体，我的灵魂，我的整颗心都属于您……”他向世界宣告：“沙皇是人间之神祇。”

但是事实上这位沙皇并不是神一般的人，而是智力发育不全，不久以后就被他的妻子剥夺了统治权。然而多亏有了他，五十岁的腓特烈二世才能在离开首都6年后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重返柏林。

然而他回来时，已是明显衰老，满脸皱纹，



满头白发了,而且“痛风病把他弄成了半残废”,皮尔·加克斯奥特在他的《腓特烈二世传记》中如此描述道。腓特烈二世自己也说:“我对挫折打击和憎恶之事已经如此习惯,对事件的发生已如此漠然,以至那些从前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情现在都从我的记忆中脱离……我的心灵渐渐地与这个流逝的世界图像相分离,而我也即将离开这个世界了……我心灵的感知能力已经到了尽头了。”当有人告诉他,结束七年战争的和平之日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时,腓特烈二世回答说:“生命中最幸福的日子是与生命告别的日子。”在战争期间他就说过:“生命真的不值得人们如此依恋。”“我的天!我实在是太累了。我现在只该归属尸骨场了……降生于世,吃尽辛苦难道值得吗?……犹如在文火上经受煎熬……我现在居然还活在世上,这几乎近于愚蠢……天呐!那些死去的人要比活着的幸福多少倍啊!”

然而腓特烈二世在他的知命之年同样也写过这样的话(写给勋爵元帅凯特):“整个亚洲式

的奢华、精美的菜肴、纵欲和女人对我们的生活来说不是必需的。我们完全可以简单一些、适度一些生活——但是，如果人们能够享受这些生存的诱惑，又何故要放弃呢？我认为，真正的哲学在于不拒绝正当的享受，同时摒弃荒淫无度。”鲁道尔夫·奥格斯坦在他的《腓特烈二世传记》中这样写道——他“从不放弃享受。由于不定量、不加选择地享用水果和辛辣及口味过重的菜肴，他的味觉和胃都给他搞得功能紊乱；小腹也跟着十分遭难，而他最爱吃的是普鲁士豌豆，这是世界上最硬的一种豌豆——就连萨克森和威斯特法伦的居民都会说：这豆子实在是太硬了！”

这个被称为十分节俭的腓特烈二世还令人在无忧宫的园子里种上了他一年四季可以享用的水果，每年大约花费2万塔勒。有一次他对他的仆人弗雷德斯多夫承认道：“你会斥责我的，昨天我吃掉了180塔勒的樱桃；我将给自己树立一个生活放荡的形象了。”冬天里每个樱桃要花费2个塔勒；这等于——再次引用奥格斯

坦——“据不完全准确的换算”每个樱桃 60 马克！

腓特烈二世非常喜爱吃，并且不加控制。他有 12 个厨师，由 2 个大师傅掌管，每天早上他都要把当天的菜单审阅一遍。他是个享乐主义者，知道如何以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正如在许多历史书中一再提到的，他每天总是起得很早，但并不是出于义务，而是因为他再睡下去就不舒服了。当他还在莱茵斯贝格作王子时常常睡到中午才起床。

腓特烈二世在五十岁时就已经觉察到自己很老了，而且也确实较早就开始衰老。他很快——与传说的不一样——便无法再吹奏横笛了，因为他的门牙掉了。看来他自己并没有料到会活得那么久。他在五十一岁时他写道：“我和世界的联姻已断，在世界抛弃我之前我就先离开了它。”事实上，他是在七十四岁时才告别人世的。



爱德华·马奈

Edouard Manet

1832—1883

在各杂志和报刊上，马奈的画被称为是“拙劣的作品”、“狗屎”、“粗俗的不正经的”，甚至有人说它们是“不可饶恕的丑闻”。

娜娜的香艳内衣

——马奈

爱德华·马奈：法国画家，对印象派产生影响，善表现外光及肖像。主要作品有《左拉像》、《奥林匹亚》、《草地上的午餐》等。

被誉为现代绘画之父之一的爱德华·马奈，1883年4月30日于巴黎逝世时只有五十一岁。此前不久，他方才得到了正式的认可，这是他几十年来始终梦想而一直未能得到的。巴黎绘画雕塑学院沙龙的评审委员会终于给马奈颁发了一枚奖章。这样一种来自官方的表彰意味着，马奈想在沙龙里展出的绘画将不会再被评审委员会拒绝。而在此之前的数年里，极其保守的评审委员会已多次将马奈的画拒之门外。比如1859年拒绝了他的《饮苦艾酒者》，5年后又排斥了他的可能是最有名的油画《草地上的午餐》。1877年，马奈几乎同样著名的油画《娜娜》，

又一次因为“不道德”被评审委员会驳回。这幅作品表现的是艾米勒·左拉的著名小说人物，风流社会女性娜娜。评论家们称她那件蓝色的缎制内衣为“豪华晨衣”，“上面的每一寸似乎都记录着她的风流韵事”。因为19世纪70年代，《巴黎人的生活》：“贤良的女人穿着式样普通的白色内衣，而不去考虑其他颜色。”

爱德华·马奈难以获得认同。由于他的画法与当时人们所习惯的不同，他采用的色彩不同，观察的方式不同，表现的手法不同，尤其是选取的主题不同，所以他的画在那些同时代批评家的眼中是“不上档次的”，在他们看来，艺术应该首先是高贵和美好的象征。在各杂志和报刊上，马奈的画被称为是“拙劣的作品”、“狗屎”、“粗俗的不正经的”，甚至有人说它们是“不可饶恕的丑闻”。

马奈为此深感痛苦。他的绘画方式使他成为一个创新者，一个革命者，但这其实完全不是他的本意。他长久以来所期望的不是别的，而正是得到舆论的认可和称誉。而当这位画家最后

终于得到了这种认可，并被授予荣誉军团骑士的称号时，他已经五十岁了，对他来说：“现在想要把 20 年的失败统统抹去已经为时太晚。”

这一切来得的确是太迟了，不仅对他的过去而言是如此，对于他的未来更是这样。马奈的脊髓病，一种梅毒引起的脊椎痠，此时进入了晚期。一段时日以来，马奈越来越频繁地感觉到精疲力尽。他的左腿也给他带来了越来越多的烦恼。当他开始为 1882 年的沙龙展制作一幅 96×130cm，题为“弗里·贝热尔酒吧间”的油画时，他已经几乎不能站立了。画面攫取了在酒吧的镜子里映照出的酒吧生活的一个片刻，那是这位五十岁的画家所喜爱却已经不能再分享的生活。马奈是在其画室里最终完成这幅作品的，并因为这一作品赢得了盛誉。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

1879—1955

“只要有机会选择，我都只会在一个所有公民的政治自由、宽容和平等高于法律的国度里生活……”

为自由而战

——爱因斯坦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美籍德国理论物理学家，创立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提出光子概念，获 1921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1929 年 3 月 14 日，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五十岁。这时，他在柏林已经生活了 15 年。1913 年爱因斯坦成为普鲁士科学院正式成员而迁居柏林，同时被任命为威廉皇家学院物理研究所的所长。那时他还不到 35 岁。7 年后爱因斯坦获得了诺贝尔奖；而早在 1905 年，当他才二十四五岁时，他就作为伯尔尼专利局的三级技术专家于《物理编年史》17 卷上发表了三篇重量级的论文。到五十岁时，爱因斯坦早已因为他的“相对论”而成为一个举世皆知的“新闻人物”了。所以，柏林市在他的生日这一天要送他一份特别的礼物，以示敬意并给他带来快乐，并没有

什么奇怪的。

人们决定送爱因斯坦一座房子。因为他喜爱航帆,所以这幢房子必须坐落在水边。负责这件事的官员很快就找到了一座合适的。房子坐落在风景如画的一块地产上,紧挨着柏林的一个湖。而且,房子的所有权属于柏林市。很快,这件事就出现在报纸杂志上;不管怎样,这样的一份礼物在当时几乎是闻所未闻的。然而,当爱因斯坦的第二任妻子埃尔莎(他与第一任妻子于1917年离婚;第一任妻子和他的两个儿子留在了苏黎士)想要看看这座房子时,却出乎意料地发现,房子里有人住着。更有甚者:住在里面的人的惊讶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她,因为无法相信自己是顶替了新房客住进来的。柏林市甚至已经以书面形式确认了他们在这幢房子里的永久居住权。

于是市政官员们向爱因斯坦建议,把这块地盘上紧挨着湖的那部分土地赠给他。他们认为那里再建造一座房子是绰绰有余的。不过爱因斯坦现在得自己花钱造房子了。爱因斯坦对这一方案表示了同意。但是这一计划最终也没

有能够成为现实。因为后来发现,市里甚至已向现有房子的居住者作过保证,在这整块地产上将不再允许建造其它房子。

接着,市政府又拿出另一块地想赠与爱因斯坦。它虽然不及第一次的地产好,也不直接临湖,而是位于第二排区域。但是临水的房主愿意为爱因斯坦专门开出一条通向湖面的通道。于是爱因斯坦和他的妻子同意接受这块土地,并自己花钱建造房屋。然而结果却发现:柏林市对这块土地根本就没有任何使用权!

市政府另外的一个新建议是:爱因斯坦自己找到一块可供购买的土地;柏林市花钱把它买下来送给他。即便是这样爱因斯坦也同意了。他妻子立即开始了寻找,爱因斯坦自己是拿不出这许多时间的。在离柏林城较远的卡普特,波茨坦的南面,她找到了一块地,紧邻哈韦尔河。夫妻俩决定要这一地产。

市政管理部门的官员也表示同意了。但是,他们说,这件事还要经过一个会议某种程度地正式讨论一下;不过这只是走一个过场而已。在



会议上有个议员却提出了一个疑问，即爱因斯坦是否值得柏林市送给他这样一份礼物。

爱因斯坦终于无法再忍耐了。他给市长写信道：

“尊敬的市长先生，人的生命是非常短暂的，而当局的工作方式则相当缓慢。如果让我来适应您的方式，那么我的一生可能就显得太短暂了。感谢您友好的心意。但我的生日已经过去了，我拒绝接受这份礼物。”

然后爱因斯坦自己买下了在卡普特的地皮，并在上面建造了一座房子，完全用木头和玻璃。房子建成后，他的妻子写道：“这样一来，本来并没有这个打算，我们逐渐拥有了一座自己的林间并且临水的漂亮房子。现在我们没钱了，但却有了我们自己的土地和家园。这种感觉更好，更安全。”

后来，有钱的朋友们送了爱因斯坦一只帆船。那是一个具有流线型外表的、6米多长的桃花心木快艇，还带有一个船室。然而这种有房有船的幸福时光没能长久。还在纳粹尚未掌握德

国大权之前，爱因斯坦就因为自己的犹太出身受到了各种猛烈的攻击。他早早就认识到在德国将无法安生。于是，在1933年希特勒接管政府后，爱因斯坦和他的妻子在一次美国之行后再也没有重返柏林。他们干脆放弃了所有的一切：房子、快艇、他的地位，他的书籍，放弃了他们所拥有的一切而选择了自由。

在他五十四岁时所作的一次公开演讲中，爱因斯坦陈述了他作出不回德国决定的理由：“只要有选择，我都只会在一个所有公民的政治自由、宽容和平等高于法律的国度里生活。政治自由指的是有关政治观点的口头、书面的表达自由，宽容则意味着每个个体的立场受到尊重……”

在流亡的开始阶段——爱因斯坦和他的妻子最初生活在比利时——他的妻子恐惧万分，她担心别人会来追捕爱因斯坦。在这种担忧之下，她恳求爱因斯坦不再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但是他不能接受这一点。“当时我们之间的分歧很严重，”她写道，“他认为我胆小，可怜可卑。”

爱因斯坦丝毫都没有想到把自己掩藏起来。相反,他抓住每次出现在公众场合的机会,一再地警告人们提防德国纳粹。

在 1933 年时爱因斯坦就坚信,希特勒一旦认为自己足够强大后就会发动一场侵略战争。他看到欧洲的自由受到严重的威胁,并且已经看到了德国军队——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样——进军比利时和法国。而他,一个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主张孤立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在其边境布置战备状态的军队,直至纳粹统治崩溃。

那段时间,布鲁塞尔正有两名拒服兵役者被判监禁,众多的和平主义者要求爱因斯坦在一个抗议宣言上签字。而爱因斯坦却试图让这些和平主义者理解他的新观点。在一家出版于巴黎的和平主义杂志上,爱因斯坦写道:“如果我是比利时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会拒绝服兵役的。相反,我会基于为拯救欧洲文化而作出贡献这一信念愉快地履行我的义务。”

愤怒的抗议声来自四面八方,爱因斯坦因为转变了态度而遭到谴责。“我请求您再一次审

视您的决定，”蓬索拜勋爵写道，“希特勒的方式可能是疯狂的罪恶的，但是我还是坚信，他没有愚蠢到期望一场战争的地步……”荷兰的和平主义者们的责骂爱因斯坦背信弃义；在法国，人们认为他幼稚无知。流亡中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一个坚定的和平主义者，称爱因斯坦是“为自由而战的队伍中的一个滥竽充数者”，并认定，爱因斯坦不再有勇气坚持自己的信念。

一时间，爱因斯坦因为他的观点而被孤立了，虽然他刚刚还是人们尊敬、崇尚、欢呼的对象。所有的人都希望他不再说话，纳粹，和平主义者，政治家，也包括许多犹太人。“我们从犹太人那里收到的愤怒的信件和从纳粹那边收到的一样多。”他的妻子写道，“同样是这些人，这些从前把阿尔伯特捧上天的人，现在来辱骂他。”

人们普遍责备他对德国状况的感觉过于神经质。这令爱因斯坦十分意外，也十分失望。

在一次访谈中，他说：“我深感困惑，为什么整个文明世界不联合起来终结这一现代的野蛮行径。难道这个世界真的没有看到希特勒将把

我们推进一场战争吗？”

1933 年，爱因斯坦离开了欧洲，带着他的妻子、秘书和一个助手去了美国，期望在普林斯顿大学开始他生命的一个新篇章。



奥诺雷·巴尔扎克

Honore de Balzac

1799—1850

“三天前我结婚了，和一位我惟一爱过的，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爱的，并且至死都会深爱的女人。……”

一个明媚的夏天

——巴尔扎克

奥诺雷·巴尔扎克：法国作家。

著有九十余部小说，主要作品有

《高老头》、《贝姨》、《欧也妮·葛朗

台》、《人间喜剧》等。

1849年巴尔扎克五十岁时，他已经完成了137卷的《人间喜剧》撰写计划中的大约80部长篇小说。在这个庞大的工程中，他将他所生活的法国社会，贵族的、市民的和小人物的世界，士兵、幸运儿、懒汉、妓女、流氓以及罪犯进行文学塑造。他有了地位和声名，但是——和许多年前一样——依旧负债累累，甚至债台越筑越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1799年5月20日出生于图尔的巴尔扎克在越来越多的债务的压迫下，一直不停息地工作。他总是在深夜写作，从子夜直到早晨七八点钟。在写作过程中他每个夜晚要喝40至60杯

的浓咖啡。这些咖啡都是他在咖啡机上自己备制的。当时身体已相当不堪的巴尔扎克——他患有严重的心脏扩张——在五十岁生日前后，经历了一件令他失望的事：由于作家夏多布里昂的去世，法兰西文学院空出了一个名额，而他却没有被法兰西文学院接受。在“40位不朽者”中，同意接纳他的只有两位，即拉马丁和维克多·雨果。

巴尔扎克的知命之年并不是在法国，而是在乌克兰度过的，在他的未婚妻，守寡的伯爵夫人夏娃琳娜·冯·韩斯卡的家中。17年前，他还没有亲眼见过这位女读者，而只是与她进行书信交往，那时，他就在给她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爱您，陌生人！这种奇异的境况是一个长久空虚而不幸的生命的自然结果……”而今，在他五十岁时，他想娶意中人为妻，把她领回自己几年前在巴黎购置的一座大房产里。为了购买和装修这幢房子他欠下了一笔巨款，并且在继续借债。当冯·韩斯卡女士从医生那里婉转地得知，巴尔扎克——他自己还不知道这一点——在尘世的时

间将不会很长了的时候，她终于下定决心实现巴尔扎克最大的心愿：与他成婚。

在乌克兰的这几个月里，巴尔扎克大部分时间病得非常严重。但这并不妨碍他再次设想做一笔异想天开的生意——这种事在他的生活中已经屡屡发生——希望最终可以还清他的债务。他在那里看到了成片的橡树林，就立即建议他未来的亲戚做一笔他们和他都可以获利丰厚的木材生意：“目前法国正需要大量的木材”，他开始作书面计划并试图唤起他们的兴趣：“我知道用于建筑或家具的橡木价格几乎翻了一倍。”他还预算，如果卖掉这些橡木——这正是他想说服他未来的亲戚去做的——去掉支付所有砍伐、锯木、运输的费用和银行家投资的回报，他们将会获得42万法郎的纯收益。“这笔生意值得我们好好思考。”他说。

他未来的亲戚们都是有钱人，什么都不缺，根本不需要好好思考，他们就会想起巴尔扎克曾经有过无数个异想天开的尝试，它们均无一例外地以失败告终。他先是借钱参股一家出版

社,不久这家出版社就破产倒闭了,巴尔扎克一分钱没挣到,反而负债累累。接着,他又以贷来的新款项买下一家书籍印刷厂,却在一年之后就经营不下去了。随后他又买下了一家铸字厂,五个月后就一败涂地。而另一家他参与投资的铸字厂的倒闭更是让他雪上加霜。之后,巴尔扎克又投资了一处银矿——同样损失惨重。他购买铁路股票也遭受相同的命运。而再后来,他又全额贷款置下了巴黎财富大街(现名巴尔扎克大街)上的一幢房子,并疯狂装修,花费惊人,而支撑他这样做的便是其一贯的、几乎难以想象的、却只是表面看来永不枯竭的工作热情。所以,韩斯卡女伯爵犹豫了这么长时间才决定把自己跟他拴在一起,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1850年3月14日,婚礼在别尔季切夫的圣·巴巴拉教堂里举行。知命之年的巴尔扎克写信给一位巴黎的老友道:“三天前我结婚了,和一位我惟一爱过的,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爱的,并且至死都会深爱的女人。我相信,这个结合是上帝一直为我留存的奖赏,作为我这么多



年的工作、这么多的恼人遭遇以及所战胜的种种困难的弥补。我的童年是不幸的,我的春天不曾有鲜花装饰;现在,我将拥有一个明媚的夏天和最甜美的秋天。从这一个角度来看,也许我这幸福的婚姻,会让您感觉到一种内心的慰藉。它向您表明,命运在长久的磨难之后还有珍藏的宝贝在最后分发。”

五十岁的巴尔扎克想把返程巴黎作为其明媚夏天的开始,但因他身患重病,而旅途遥远,途中又有积雪,行程一再推迟。“我的心脏病和肺病又一次严重复发,”他写给在巴黎的七十高龄的母亲,她负责照看他的房子,“在我眼前笼罩着黑纱,它还不愿意消失,而把一切都遮盖了起来……”14天后他又写信给他母亲:“给你写这封信,我几乎认不出字母来。我的眼痛事实上既不允许我读书,也不允许我写字了……我觉得很不舒服,我的心脏、我的肺都让我觉得不对劲。每个动作都让我呼吸困难,发不出声音来。”

但是他不愿意再等了,他想回到他自己的房子里;于是,尽管他身体状况不好,道路泥泞,

他们还是出发了。1850年5月11日,他五十一岁生日前几天,他从德累斯顿写信道:“这段本来只需要走6天的路,我们花了整整一个月时间。不是一次,而是上百次,我们面临着生命危险。在暴风雪中我们常常需要15或16个人帮我们从泥坑中拉出来,我们的车子深陷泥潭及至车窗。不过,我们最终还是来到这里,并且还活着,虽然我们都疲惫不堪,身体不适。这样一趟旅行可以使人衰老十年。你完全可以设想那种恐惧感,两个如此相爱的人的恐惧,生怕一个人在另一个人的怀里死去。”

拖着一身病痛,巴尔扎克和他的妻子于子夜时分到达了他在巴黎的住所,——正如他事先安排的——所有的房间都灯火通明。但是没有人替他们开门。他的母亲,按照他的吩咐不应在他们到达时出现,已经去了她女儿家,而仆人把自己锁在了一个房间里,精神失常了。巴尔扎克不得不撬门进入自己的房子,然后立即让人把仆人送到一家精神病院。直到这时,他才终于和他的妻子完成了——如他所言——向往了

25年之久的进驻,进驻自己的家。但是事实上,他只是在走向死亡时走进了这幢房子。

“巴尔扎克的命运之规则一再重演,直至最后,”斯蒂芬·茨威格在他的《巴尔扎克传》中这样写道,“他只能在书中,却永远不能在自己的生活里塑造他的梦想。”入住新居几个星期后,死神降临了。“他的生命虽然短暂,但却充实;这是著作比日子更为富饶的生命,”维克多·雨果在巴黎的拉雪兹墓地举行的葬礼上说,“哦,这位强大的、永不疲倦的工作者,这位哲学家、思想家、作家,这位天才,他在我们中间生活过,经历了那样一种充满了风暴和斗争,所有伟大的男生命定的一生。今天,他宁静地安息了……这不是黑夜——这是光明。这不是虚无——这是永恒。这不是终结——这是起始……”



萨尔瓦多·达利

Salvador Dali

1904—1989

“我和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们保持联系，他们正在研究把人的身体通过冷冻而保存起来的可能性。……”

捉弄死神

——达利

萨尔瓦多·达利：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作品以探索潜意识的意象著称。代表作有表现幻想境界的《记忆的永恒》等。

每个人都希望长寿，但是几乎没有人希望作老人。然而万事皆有例外。其中一例便是1904年5月11日出生于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省菲格拉斯的萨尔瓦多·达利，他既是一个多产的作家和也是一个作品丰富的画家。不管怎样，达利反正是经常写道，他希望自己是老人，而且还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就表达了这个愿望。他解释说，只有这样他才能远离那些年轻小伙。

在他的绘画中达利经常研究时间，研究它的流走和消失（比如他1931年创作的名画《记忆的永恒》）；他再三地表现钟表。他的钟表处于一个完全不真实的环境里，他可能想提醒我们过去的

时光,建议我们珍惜时间。他把他的钟表画得松弛、柔软、可弯曲,把它们放在一个枝桠上,让它们在桌子的、书架的或书本的边缘上弯曲,仿佛将它们软化了,同时也软化了时间,他似乎要用这种方式使时间延伸。因为这位很早就感觉自己是活着的最伟大的天才、至迟在他生命的第五个十年的末期已对自己的神性深信不疑的人,是不愿意相信时间也会从他身上流逝的。这个神一般的人物有可能终身都愿意不仅长寿,而且作一位老人,有一点是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的:以死亡终结他的生命。有一次他这样写道:

“在死亡面前,……我就像风中的树叶那样颤抖不已。早在孩童时,当我听到别人说死亡不可避免时,我总是大声喊道‘骗人的谎话!’我过去认为,在最后一刻事情总能得到改变。我现在依然持这种观点。天主教的教条认为灵魂不死是有道理的。但是我没有信仰——信仰是神的恩赐——我把希望寄托在我的时代提供给我的科学的进步上。我和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们保持联系,他们正在研究把人的身体通过冷冻而保

存起来的可能性。我也和一些研究者有接触,他们想通过在宇宙中的一次以光速进行的漫游,使人变得年轻。达利将成为通过这样一种方法超越他的时代并赢得新时代的第一人。这样,我还可以实现成千上万的事情。”

当达利写下这段文字时,他已经是六十岁的人了。10年前他就已经开始对冬眠疗法感兴趣,即通过降低体温而导致冬眠。从此之后他密切关注这个领域内各种使人通过冷冻而在某种程度上不死的研究、设想和尝试。这个神性的达利事实上太聪明了,不会真的相信这种方法,他只是不想只在精神上不朽,他从来没有怀疑过他的精神不朽。然而,他希望和他的妻子一起,他深爱的加拉,肉体也可以不死,而在他之前就离开了人世。他寄希望于冷冻的可能性(或者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但是不久他就明白,这只是一种欺妄而已。在另一本书里他这样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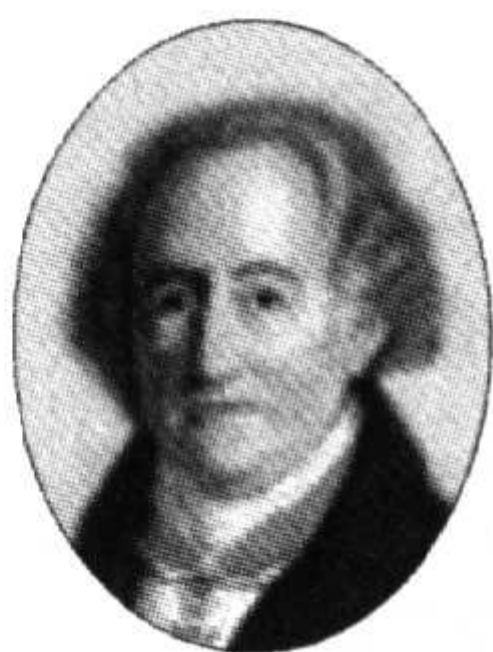
“我经常想到死亡;我不断地思考和研究死亡这个问题。通过把它的精神融进我的梦里、融入我的思想、我的激情、我的感受,融进我的肉

体且深入骨髓，以此将死亡混杂到我所有的创造中并对之进行不断的加工。我越是强烈地意识到存在的伟大，就越能感受到死亡的临近。这种感受越是得到肯定的证实，我就越是活得轻松，我喜悦的心情就越强烈。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要点手段。我收集黄金，好让人们可以在我告别人世的那一刻把我放到冷藏室里去。我想捉弄一下死神。我要在下个世纪三次、四次地从氮圆柱中重生，把髭须捻得高高的，手里拄着拐杖……”

他真的相信这个吗？在这里他补充道：“我明白，毁灭是致命的。结局可能是令人彻悟的，可能是庄严神圣的，然而是无以挽回的。”这种对死亡的恐惧甚至体现在对外在身体的变化的恐惧上，四十岁末的达利恳求地写道：“白发啊，请你们离开我！白发啊，请你们离开我！”而等到他五旬的中期时，又能平静些了：“我写完《我的秘密生活》的收场白 20 年之后，我的头发依然乌黑，我的脚上也没有任何退化的钉胼的征兆，我的肚子，它曾经一度变得圆拱，在我动完盲肠

手术后又恢复了它从前的平坦。”

至于工作热情，五十岁的达利丝毫不用担心。这位神人五十岁的那一年，也就是1954年，是他生命中创作最多、成就最大的一年。他写了诗意剧《性感—神秘的谵妄》，一部五个人物的三幕剧，这部戏——如他自己所说——由于“它大胆的性感表述只能在可以想象的最严格的私人圈内表演”，他写了《神性反侯爵的120天罪恶》。那一年他也开始了他的电影《花边女工和犀牛的神奇历险》。同时，他还作了许多画。围绕着一幅画的酬金，五十岁的达利在纽约还进行了一场令人瞩目的诉讼。他曾给一女子作肖像画，但该女子不愿意付钱，因为她没有认出画上的人就是她。达利为此控告该女子。这场官司给这位一生都在追逐金钱的神人带来了众多的非常具有广告效应的新闻报道。



约翰·沃尔夫

冈·冯·歌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

“对一个一定岁数的男人来说，最安全的保养办法就是远离漂亮的异性。”

漂亮异性和美食

——歌德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德国作家，公认的世界文学巨人之一。集文学艺术、哲学、政治等成就于一身。代表作《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列那狐》、《诗与真》、《亲和力》等。

当 1749 年 8 月 28 日出生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约翰·沃尔夫冈·歌德五十岁时，他的面前还有漫长的、成果丰硕的岁月，即大约 33 年的时光在等待着他。在这 33 年里他不仅极富创造力，而且一再重焕生机，很会生活，甚至还多次坠入爱河。但是在知命之年，歌德并不特别乐观。甚至可以说，五十岁的歌德正经历着一种“中年危机”。当时这位作家在魏玛已经生活了 24 年，任公使馆参赞和卡尔·奥古斯特公爵宫廷秘密顾问。他起先主持魏玛战争委员会，负责

道路建设管理,之后主管最高财政部门。但当他从漫长的意大利之行回来之后,他卸去了几乎所有的官职,尽管他依然享有同以前一样的薪水。总而言之,这位一生都忌讳听到和看到任何有关疾病、年老和死亡的著名作家,曾经非常艰难地从生命的第五个十年跨入到第六个十年。他在日记中没有提到五十岁的生日很可能不是偶然(同样也没有提到六十岁生日和七十岁生日)。他肯定没有忘记自己的生日,但是这个日子与衰老联系在一起,想到这一点歌德是很不轻松的。在他五十岁生日过后没几天,他写信给席勒,说他的状况“开始变得有点僵持”。歌德这里想说的东西,体现在他这个时期创作的中篇小说《五十岁的男人》里。这部小说后来搁置了很长时间,直到最后歌德将它插入了《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一书中。

歌德在该小说中塑造的五十岁的男人是一位少校,他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年轻貌美的外甥女,俩人即将成婚。这一安排了很长时间的计划眼看要落空了,因为儿子喜欢上了另外一个年

长的女人,同时少校却爱上了自己的外甥女,而她也热情地崇拜着少校,觉得自己很爱他。外甥女的母亲(也是少校的姐姐)对这件事的看法是:“这也没什么太不自然的……记得我年轻的时候,也对一个年纪大的男人钟情过,那个人当时比你现在还老。你今年五十岁,这个年纪对于德国男人来说,并不算老,因为德国人不像其他更活跃的民族那样容易衰老。”这位少校起初想放弃这份对他外甥女,也就是他未来的儿媳的感情,但是当他看到明媚的春光里的树木时,他的想法又开始变得积极了:“他,”歌德写道,“看到了这么多树重又抽芽长叶,感到自己也能够重新焕发青春了。”但是仍然有些东西令他产生顾虑:“当他站到镜子前面,发现自己已经不是他所希望看到的那个人了。他不能否定那几缕灰白的头发,而且脸上也显出了皱纹。”

这个时候少校的一个老朋友恰巧来访,这是一个比少校年长十岁的演员。俩人已有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少校吃惊地发现,这个比他年长很多的朋友居然看起来比他强得多。五十岁

的少校说：“使我感到吃惊的是，你看上去竟然比我精神，比我年轻。因为我还记得，当年我啥都不怕，帮你解难时，你已经是一个很老成的人了，而我还是一个鲁莽小子。”

这位“上了年纪的年轻人”作出了这样的回答：“这是你自己的过错，这是所有你们这一类人的过错。虽然不必为此对你们大加谴责，但还是需要进行批评。人们总是只考虑必要的东西，只要内容而不要表象。然而，当最后内容和表象一起开始告退，而表象比内容消退得更迅速时，每个人就都会发现，他要是没有只顾内心而完全怠慢了外表就好了。”

少校同意他朋友的看法，对方现在则向他指出具体的问题，并毫不掩饰地夸耀自己的外貌：“像你这样，两鬓发白，满脸皱纹，头顶光秃，是一种不负责的表现。你好好看看我这个老头子！仔细瞧瞧我保养得怎么样？并不需要魔法；为此所耗费的精力，比起人们每天用以损伤自己的身体或者给自己制造无聊的力气要少得多。”

随后少校就了解到了整个秘密：“我可以跟你讲很多，而且我一点也不夸张：我随身带着一个小化妆匣，这是最关键的东西。只要我们能在一起呆上两周，我就会让你在自己身上看见这小匣子的作用。”

少校看起来对这个建议有些犹疑：“他个人还是愿意花更多的精力去料理外表的，但是人们总是把所有注重外貌的人不由分说地都看成是爱慕虚荣的人，虽然他们从感官上讲不能不对之另眼相看，却马上不再对他怀有道德上的敬意了。”

他的朋友反驳他道：“你只需要仔细想想就不难明白，那些被人常常指为虚荣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感到快乐，具有这种快乐的人，是幸福的人。有了快乐又怎么能不表露出来呢？他怎么可能身在生活之中而掩饰其对生活的乐趣呢？……上帝保佑！如果所有的人都虚荣，但要是自觉的、有分寸的、正确意义上的，那么，我们这些有教养的人就会成为最幸福的人了。有人说，女人天生爱虚荣；但这样她

们就娇美，我们也就越喜欢她们。年轻人不虚荣怎么能够雅致起来？一个空洞的天性至少还知道给自己弄一个表象，能干的人更要从外表到内心都高雅。”

这个五十岁的男人接受了他的建议。在演员朋友的仆人帮助下，他每天晚上烦琐地用各种润肤霜、爽肤水、放松性的沐浴和湿敷为夜晚作准备。同样也在每天上午为白天打扮。令其惊讶的是这一切少校都很喜欢，尤其是他不久就感觉自己年轻了，可以以新的姿态出现在他的外甥女面前了。但另一方面他为此所耗费的大量时间和所感觉到的强制性而气恼。当有一天仆人要离开他，回到已经上路继续其旅程的演员身边去服侍时，少校很高兴：“我又可以作我自己了。”

和外甥女结婚最终没有能成，这首先不是因为那个会保养的演员朋友的劝告；他告诫这位上了五十的人：“对一个一定岁数的男人来说，最安全的保养办法就是远离漂亮的异性。”更重要的、歌德作了详细解释的原因是：“少校

不久前掉了一颗门牙,他担心还会掉第二颗。他不考虑镶假牙,但带着这个缺陷去追求年轻的恋人,让他感觉很丢面子……”

歌德可能有过同样的经历,他对此补充解释道:“迟一点或早一点,也许都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可在这节骨眼上,任何一个习惯了整体性健康的人都会对此极力地抗拒。他仿佛觉得自己这座有机的整体已经被抽去了支撑,接着,剩下的构架也面临着一步步相继倒塌的危险。”

歌德在这个时期对男人的保养问题进行如此详细的研究,显然不是偶然的。他在探询:一个五十岁的男人是否应该以及应该在何种程度上借助化妆品保养自己的外表,甚至想法使自己变得年轻。很可能是他自己的外表促使他进行这种思考。就在这之后不久,夏洛特·冯·施泰因的儿子,卡尔·冯·施泰因这样描述歌德:

“他步履相当缓慢,腹部下垂,就像一个身怀六甲的妇女,他的下颚垂到了脖子处,四处都

是清水汤的痕迹；脸颊肥胖，嘴总是半张着；目光朝天；他的帽子更是往上翘；他的整个表情就像一种自足的无所谓态度，但是看不出一点喜悦之情。他让我同情，这个美丽的男人，他的体态曾经显得那样高贵！”

歌德这么厉害地横向发展，其实并不奇怪：他不参加任何体育锻炼，五十岁后不再骑马，而总是坐在马车里，他吃得、喝得实在太多了，或者如作家让·保尔在拜访了四十七岁的歌德后毫不含糊地写道：“他那狼吞虎咽的样子！”并补充道：“第二天开始，我就在这里抛弃了那愚蠢的对大作家的先入之见，他们和其他人没什么两样。”

很多人对这位枢密参赞在 10 点钟的早餐上就大吃烤鹅和鲱鱼感到惊奇。歌德园子里每星期的野餐因其丰盛而闻名，女士们提供美味菜肴，男人们捐出葡萄酒和香槟。夏洛特·冯·施泰因夫人对晚餐上丰富多样的“由甜点师傅制作的精美糕点”和自助冷餐上“像艺术品一样精致的菜肴、虾蟹等等”曾作过描述。



这个时期歌德每天喝3瓶葡萄酒。他强烈排斥咖啡和茶，因为他认为它们有毒。他不抽烟，不吸鼻烟，因为他鄙视那些叼烟无赖，他从他们的烟草享乐中已经预见了德国文化的终结。看样子他在葡萄酒中没有发现任何危险。对克里斯蒂娜也同样没有什么危害，她在喝葡萄酒方面已经成为了他好学生，这是她从他那里学得最快的东西。虽然他的儿子奥古斯特还小，歌德也完全不反对他经常喝葡萄酒。直至奥古斯特有酗酒的倾向时，父亲才劝戒他要适度，自己的饮酒也收敛了点。

歌德五十岁时，克里斯蒂娜三十四岁。她也好吃，身材结实滚圆，看起来正是处于生命的旺盛期。她的热情在此之前和在以后的十年里都倾注在了跳舞上。她不放过任何一次在魏玛和近郊的公开舞会。她总是带着奥古斯特一起去参加舞会活动，在那里和朋友聚会。尽管在魏玛城里许多人对此加以嘲讽，但是歌德允许她有这种享受。克里斯蒂娜当时还奔放的生命力和生活热情是否让这个五十岁的歌德增强了自己

是个老人的感觉了呢？他越来越频繁地从魏玛，从他那不安静的房宅回到耶拿，在耶拿宫殿里他有一间小工作室，这里有他需要的宁静。他把10年前写的小诗整理成册，翻译书籍，口授书信，继续他的色彩学研究。据让·保尔说，“他认为他的创作生涯已经结束了”。

然后，1800年底，他甚至在圣诞节、并且还是他儿子的生日期间也将克里斯蒂娜和奥古斯特单独留在了魏玛，自己呆在耶拿的僻护所里，而这时他生病了。这次他病得很重，以至于有些医生觉得他已经无药可救了。夏洛特·施泰因夫人对她儿子弗里茨说：“他得了痉挛性咳嗽和天花癍丹毒。他不能躺在床上而必须站立着；不然他就会窒息而死……”

14天后她报告说，歌德好些了。但是她又补充道：“只是他情绪很不好，很悲伤，已经哭了三个小时了。特别是在见到奥古斯特时就哭得更伤心。这个孩子现在躲到我这里来了。这个可怜的孩子真让我同情，他非常悲哀。但是他已经习惯了喝闷酒，打发他的痛苦。最近他在一个俱

乐部里连喝了 17 杯香槟。他在我家里时,我总是费劲心思不让他碰葡萄酒。”

歌德回到魏玛后很缓慢地逐渐恢复,他是从——他在一封信中写道——“近在眼前又远在天边的死亡之国的边缘上”,“重新跨入生命的”。“生病期间承受了什么样的痛苦,我知道得不多。新年过后不久,事先并非没有一点预兆,病痛就把我袭倒,使我的身体经历了各种方式的罕见的折磨。以至于有一段时间,即使是最有经验的医生也对我的康复产生了怀疑。这种状况持续了九天九夜,而我对此也记不得什么了。”

这场危及生命的疾病过去之后,歌德才让他的亲生儿子“转正”合法。他以各种方式请求邦君,允许奥古斯特·武尔皮乌斯使用歌德的姓。(而与克里斯蒂娜成婚的决定是歌德在 5 年之后才作出的。)然后,歌德带着奥古斯特去琵芒一个疗养地休假 12 星期。他给克里斯蒂娜写信道:“奥古斯特非常快乐。充足的睡眠,散步,少量的饮酒,吃点樱桃、草莓,洗澡等等,这一切对他非常

有好处……此外,我们经常想你。奥古斯特每天为你的健康干杯。”



玛丽·居里

Marie Curie

1867—1934

“……人类同时也需要
梦想者，对他们来说从事、
推进不为私己的事业是如此
具有吸引力，以至于他们
全然顾及不到个人的物质
利益。”

实现梦想

——居里夫人

玛丽·居里：生于波兰的法国物理学家，化学家。由于发现放射性获 1903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发现镭获 1911 年诺贝尔化学奖。

生活在歌德一个世纪之后的女物理学家玛丽·居里在她生命的第六个十年里的境况与歌德完全不同：她根本就没有时间去作歌德那样的喘息，那样一个创造期前的大休整。她被牢牢地拴在她一战期间额外接受的各种项目上。玛丽·居里，1867 年 11 月 7 日出生于华沙一个中学教师之家，曾两次因其名副其实的改变世界的科学发现而获得诺贝尔奖。1903 年她与丈夫皮埃尔·居里和她的老师安东尼·亨利·贝克勒耳一起获得诺贝尔物理奖。1911 年，她个人又因为成功地从大量沥青铀矿中提取纯镭而被授予诺贝尔化学奖。其间她还获得了另外

一个荣誉；三十八岁时，她成为她丈夫——他在一次事故中殒命——在巴黎索邦大学物理教职的继承人。战争期间玛丽·居里以 X 射线机构领导者的身份在法国军队里工作。这份工作要求投入大量的精力，因为在医学领域 X 射线和镭的利用在当时还非常新，总是会不断碰到新问题。除此之外她还要授课，辅导学生。另外，她还要照顾她的两个女儿伊蕾娜和爱娃。

玛丽·居里不仅把她所有的精力和全部的知识服务于法国，还有她的一大部分钱财。“政府要求人们上缴黄金，不久就要发放贷款了，”她同她女儿伊蕾娜说道，“我将把我仅有的一点黄金和我的奖章交出去。还有：因为图省事，我把我的第二份诺贝尔奖奖金——这也是我的主要财产——换成瑞典克郎存在了斯德哥尔摩。现在我想把它们转帐到这里来，当作战争贷款。国家需要这笔钱。我心里很明白：这笔钱很可能就没有了……”

她的预见是对的；她用瑞典克郎换来的债券越来越不值钱；她交给法兰西银行的黄金也

一去不复返了。只有她的奖章没人想拿走。这在她看来则是愚蠢的拜物教的表现。对于她来说，个人的财产并不重要。重要的始终都只是科学，她坚定地相信科学会不断发展。基于她在战争期间任 X 射线研究机构领导得出的经验，她写道：“战争伦琴射线学的史实提供了一个动人的事例，它表明，在一定的情况下，纯科学的发明会怎样令人意想不到地得到扩大运用。战前伦琴射线只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被使用。而战争这一全人类的灾难促使人们尽可能去拯救，受害者的数目越惊人，这种拯救的愿望越强烈，利用每一种方式手段，去拯救和保护人类的生命。——我们马上就会看到大家对伦琴射线所寄予的期望：最大限度地使其发挥作用……类似的还有镭放射疗法和放射性元素在医学领域的放射使用。——这些 19 世纪末由于科学的发展而为大家所知的新射线，我们应该如何利用这些意外的研究成果呢？我们的工作热忱看来还有必要增强。”

她自己就是发现这些新射线以及新放射性

元素的科学家之一，而这一点因为她固有的谦虚而只字未提！玛丽·居里和皮埃尔·居里从来没有想过要从他们的发现中获取任何个人的利益和好处。当有人就这一点问到五十岁的居里夫人时，她回答说：

“我的许多朋友认为，而且并非没有道理，如果皮埃尔·居里和我懂得利用我们的权利，我们早就创下了建立一个实用镭研究所需要的经济基础，而不必遭遇重重阻碍，这些障碍曾经像手铐一样捆住我们手脚，如今依然在束缚我。尽管如此，我依然认为我们的做法是正确的。当然，人类需要注重现实的个体，他们有能力从自己的工作中获得最大的收益，在不忘记大众福利的条件下保护他自己的利益。然而，人类同时也需要梦想者，对他们来说从事、推进不为私己的事业是如此具有吸引力，以至于他们全然顾及不到个人的物质利益。”而且玛丽·居里认为，一个管理良好的社会必须为这些没有个人财富需求的理想者创造一定的条件，以使他们能够无忧无虑地、自由地在他们为科研献身的生活中

中完成他们的使命。

然而她并不能无忧无虑地生活。沉重的负担压得她喘不过气来，而且不仅仅是来自金钱方面的。五十三岁生日三天后，在一封信中玛丽·居里写道：“我的眼睛和耳朵现在是我最大的烦恼。我的视力现在非常弱……而我的耳朵感觉到几乎不间断的、时常很大的嗡嗡声。我非常不安：这干扰了我的工作——几乎使我不能工作。这种视力和听觉的干扰可能与镭有关，但是不十分确定。——这是我的痛苦。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不想让这个消息散布开来……”

玛丽·居里的视力下降得如此之快，以至于她害怕五十岁就要完全失明。视力下降的原因并不在于镭，尽管多年以来她在工作中没有采取任何保护措施，受到了很多镭辐射，而是——最后诊断出来——因为白内障。当时五十五岁的居里夫人要求动手术。手术后她以惊人的毅力重新学习看东西：“我已经习惯不戴眼镜走路，而且还取得了进步。”她第一次手术后在地中海沿岸的疗养地写信给她的女儿爱娃，“我试

着在路面相当糟糕的山石路上散了两回步,情况相当好,我能迅速而平稳地前进。最让我头疼的是重影,它使我认不出走近我的人。每天我都做阅读和书写练习。目前我觉得读写比走路更困难……”

最后,借助于度数很高的眼镜她又能看得很清楚了,这样她能在实验室进行强度很大的测量工作。于是她继续工作,尽管她现在需要越来越频繁地休息。五十九岁时她表示:“有时候我丧失了所有的勇气,我对自己说应该停止工作了,搬到乡下,从事园艺吧。然而千头万绪缠住我,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这样安排。尽管我可以写科研著作,但我不知道我的生活能不能缺少实验室……”另外有一次:“很明显,我已经不能再活很多年了。”居里夫人继续每天在实验室里工作很长时间,她的目标是提取出化学纯粹状态的放射性元素钋。然后她还想实现她的拥有带花园的房子的梦想:“我想拥有一座房子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实现这一计划是我的向往。建造费用控制在我的承受范围之内。已经可以开

始实施了。”

当她给姐姐写下这段文字时，她六十六岁。一切都已经太晚了。八个星期后，居里夫人因有害放射而引起的恶性贫血与世长辞，成为被她所提取的镭的牺牲者。



阿尔玛·马勒

Alma Mahler

1879—1964

“你们这些傻瓜怎会知道我内心的喜悦呢……我用铁爪抓取我的巢穴……每一个天才恰恰是我合适的麦秆……”

天才们是建巢的麦秆

——马勒夫人

阿尔玛·马勒：奥地利画家申

德勒之女，作曲家，20 世纪作曲技

法先驱古斯塔夫·马勒之妻。

1879 年 8 月 31 日出生于维也纳的阿尔玛·马勒，年届五十时心怀的忧虑与玛丽·居里完全不同。这位女士正在考虑是否缔结她的第三次婚姻，尽管她曾把婚姻称为“被国家许可的暴行”。阿尔玛·马勒是当时维也纳非常有名的画家申德勒的女儿。她与比她大将近二十岁的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结婚 9 年，直至他 1911 年去世。之后她与年轻的表现派画家奥斯卡·柯柯什卡有过一段热烈而短暂的关系。1915 年她与建筑师瓦尔特·格罗皮乌斯结婚，三年后离异。眼下，在她的知命之年，她考虑是否应该和比她小十一岁的作家和诗人弗兰茨·韦菲尔建立家庭，这又是个天才般的人物。在此前不久她

在日记中写道：

“你们这些尘世傻瓜又怎么会知道我为自己设想的幸福呢……一部分是由于爱情的迷醉；……一部分来自音乐的陶醉；……一部分是葡萄酒的作用……你们这些傻瓜怎会知道我内心的喜悦呢……我用铁爪抓取我的巢穴……每一个天才恰恰是我合适的麦秆……作为我建巢的猎取物……”

几天后她又写道：“十年来我性情不定，扮演着任意的一种角色。对于外界，我是那个有名诗人的所谓幸福的情人。但是我自己觉得既不是他的情人，也不是他的妻子。他希望结婚，尽快地，但是我内心有些东西不愿意这样。”一年后她还是嫁给了他。婚后一年她又抱怨道：

“男人们是如此的可怜，需要帮助……十五年来我给予了弗兰茨·韦菲尔最忠诚的帮助，一直在帮他，他却从来不会说一句感谢的话。一切都是理所当然……我全身心的付出是一种必须。——古斯塔夫·马勒比他绅士。他虽然是很晚才意识到……却是至深地意识到了。弗兰茨·

韦菲尔则永远也不会认识到这一点，即便我离开他……或者我死去。”

他们生活在维也纳，这位年届五旬的女士为自己和韦菲尔在那儿布置了一幢很大的老式富宅。阿尔玛·马勒-韦菲尔在威尼斯也拥有一幢房子。她经济上相当宽裕。因为她从马勒的音乐版权中收益颇丰，而马勒的音乐也正是因为阿尔玛的努力才获得越来越大的成功的。而弗兰茨·韦菲尔当时在写他的小说《那不勒斯的姐妹们》，也从他的书中挣了不少钱。但是好景不长。1934年初，当时五十四岁的阿尔玛在日记中写道：“我很为弗兰茨·韦菲尔担心。他现在的处境很不好。从出生到现在四十多岁，他都是个幸运儿，事事如意。父母、姐妹，家族财富，他日渐上升的名望……而现在突然间：德国开始迫害犹太人。他的书被烧毁——他不再受青睐——一夜之间他成了一个才能一般的多嘴的小犹太，而如今你的成功全掌握在这帮人的手中。现在我将真正与他患难与共。”

阿尔玛·马勒-韦菲尔的担忧不无道理。同

样她自己也面临着一段艰难时光，尤其她的女儿马诺的天折更加深了这份艰难。“没有什么让我留恋的了。我想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还缺少结束的勇气，”这位正值五十中旬的女士写道。“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弗兰茨·韦菲尔和我为了她的康复努力了整整一年，我最美丽可爱的孩子还是被夺走了。上帝的安排实在无法理解。”

三年后，1938年，阿尔玛和弗兰茨·韦菲尔离开了被希特勒扫荡过的奥地利。他们先去了瑞士。——“现在我们成了流亡者，”——然后去了法国。8月31日，阿尔玛五十九岁生日那天，她在日记中写道：“又是一个必须挺住的生日。我都经历了些什么！在这样地狱般的泥泞里我跌跌撞撞，站起来了，又倒下去了……我想作一次冬眠……忘记所有的痛苦……我已经精疲力竭了。弗兰茨·韦菲尔的存在是惟一支持我活下去的理由。”

1940年，阿尔玛已经是上了六十的人了，弗兰茨·韦菲尔五十岁。他们越过西班牙逃到了美国。5年后韦菲尔死于心脏病，或者说——阿

尔玛后来认为——因为抽烟过多而死亡。她在他身后还生活了将近 20 年，在这些年里她撰写了回忆录。这位八十一岁高龄的女士在结束她的回忆录时承认：“我的一生是美好的。上帝赐予我机会，让我及早地认识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天才，在其缔造者的双手离开他们之前。如果我曾经能为这些逐光骑士助上一臂之力，那么我的存在就是有意义的，是上帝的恩赐。——我的一生就像是一本打开的书摆在我的面前。我还能看到我父亲的死，古斯塔夫·马勒、马诺和弗兰茨·韦菲尔的死。一生中我失去了很多东西，但是我没有埋怨的理由。我所经历的幸运和幸福抵消了这些痛苦。——我相信一个人只要细心地注意，他是能够看出他的命运的脉络的。他也会受到一个内心声音的警告。但他必须能听得到这个声音，必须能够倾听它。——每个人都能做一切，但是他也必须想要去做、准备去做一切。”



理查德·瓦格纳

Richard Wagner

1813—1883

“我需要的东西，这个世界亏欠着我！我不能像你们的大师巴赫那样过一个贫困的管风琴师的生活！……”

童话般的转折

——瓦格纳

理查德·瓦格纳：德国作曲家，
毕生致力于歌剧的改革与创新。作
品有歌剧《漂泊的荷兰人》、《纽伦
堡名歌手》及《尼伯龙根的指环》
等。

理查德·瓦格纳在他五十岁生日的前几个月作出决定，在经历了这么多年动荡不安的生活之后，现在最终要安定下来了。瓦格纳于1813年5月22日出生于莱比锡一个警局书记员家庭。在生命的前50年里，他被迫在许多国家流浪，一段时间是由于政治上的迫害，因为他同情1848年革命；大部分时间则是为了逃避债权人。1863年5月22日，瓦格纳终于可以在维也纳庆祝他的五十岁生日了，其热忱友好的气氛是此前几乎所有的生日都没有经历过的。为了表示对这位“尊敬的大师”的敬重和仰慕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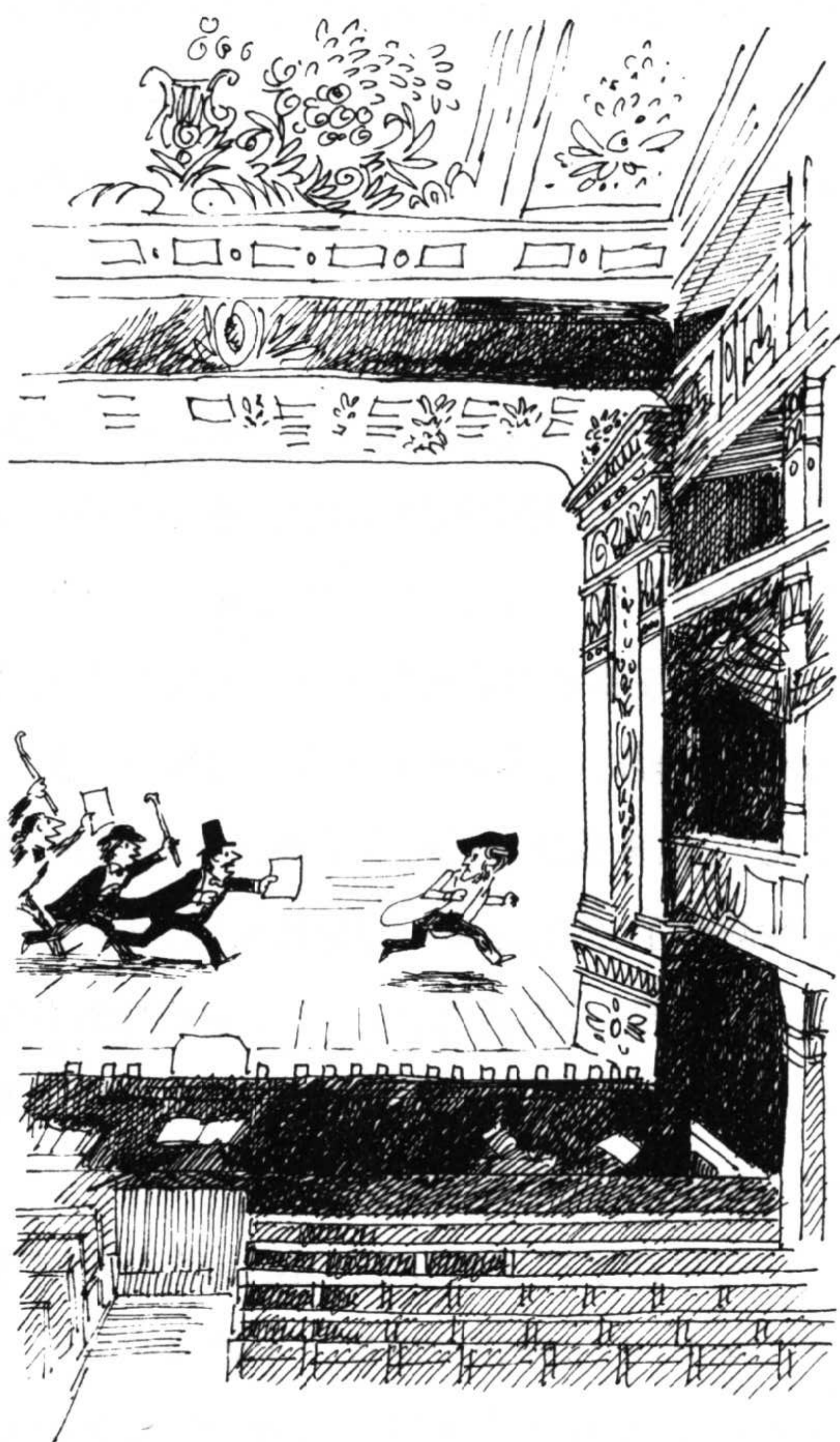
情,学生们和演唱团举行了一次火把仪式,虽然不是在生日当天,而是距生日三个星期之后。瓦格纳,当时已经创作了《黎恩济》,《漂泊的荷兰人》,《汤豪赛》和《罗恩格林》,数年来又在从事《尼伯龙根的指环》和《纽伦堡名歌手》的创作,并且在写音乐剧之余还发表了一系列文化政治方面的文章。而直到这时,在他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音乐会所得的酬金支付了最紧急的债务,还余下了 4000 塔勒时,他才认为自己终于也有了一个经济基础,决定要选择一个固定的居所了。

起先他在各种选择面前犹豫不决,是要位于比勃利希的一座乡村别墅,还是宾根的消夏别墅,或是在瑞士找一处乡宅,或者在维也纳置一套住房。最后,他选择了最昂贵的一个方案,为他自己也是为后来者马丁·格雷戈尔·戴林:以年租金 1200 塔勒的价钱租下了位于美泉宫花园内,离维也纳歌剧院步行只需半小时的一座别墅的一层。房间如此宽敞,足够容纳一个大家庭。在这个楼层里他把他对丝绒和丝

绸的热爱发挥得淋漓尽致：他让人在这个巨大的居所里用昂贵的台毯、厚重的窗帘、华丽的鞍褥，用地毯、软垫、花边桌布和丝绒家具布置起来。同时，他还雇佣了一个保姆和一对管家夫妇。

然而这一切远远超出了他的经济承受能力。他在汇票上签字，而这些汇票只有通过借高利贷才能兑现。“汇票数目远远高过他得到的现金，”格雷戈尔·戴林这样写道，“他每年必须支付这笔帐款的200%的利息。”他又一次把自己折腾进了一个几近毫无出路的绝境里。这个永久被逐赶的人曾经有一段时间住在玛蒂尔德·韦森东克女士家避难。后者是苏黎士一个富商的妻子，近10年来一直对瓦格纳给予支持，她写信给瓦格纳说：

“您总是匆匆忙忙地抓住每一次新的迷误，好像是为了抹去心中对以往多次失迷的不满。没有人比您更清楚地知道，这根本不可能也永远不可能。朋友，这状况如何才能结束？50年的经验难道还不够吗？您到现在还不该清醒过来吗？”



这个比瓦格纳年轻许多的玛蒂尔德·韦森东克显然还相信，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变得聪明起来。然而问题在于，人的内心，他的精神和心灵是否也跟着长。五十三岁的罗伯特·穆西尔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在1933年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心灵不会变老吗？至少不是那么持续不断地变。起保护作用的躯体在老化，被保护的和被包裹的却没有。总之，它们的老化方式是不同的。我们在年老时看颜色，听声音，闻和尝东西与我们年轻时的感知相差无几。理解力一般是变化了，但多数是增强而不是减弱。对事物的敏感性减弱了，然而这是很容易补偿的，并不是一下子老化的。总而言之，在一个年老的身躯里藏着一个年轻的灵魂，或在某些方面甚至是幼稚的灵魂，这是众所周知的。”

而只活了四十五岁的英国小说家和剧作家奥斯卡·王尔德曾经说过：“年龄的悲剧并不在于人老，而在于人年轻。”理查德·瓦格纳和许多其他人一样，在他五十岁时无疑依然年

轻。他满脑子都是计划,尽管经济拮据,依然怀有很多梦想,并且乐观地相信:在某个时候能找到一个或许多个赞助者。无论如何,在五十一岁的他还是这种状态。但是,当接下来的几次音乐会巡演的酬金没有余下任何钱,甚至他还为了充实巡演资金,以90塔勒的价钱把巴登大公送给他的一个金罐卖掉,在发生了这一切以后,他才不得不承认,他的那些老朋友都不愿意再帮助他了。这个时候,他的情绪开始有所改变。同年,瓦格纳到钢琴家汉斯·冯·比洛柏林的家去拜访,在那里结识了比洛的妻子科西玛,即匈牙利作曲家弗朗茨·李斯特的女儿。在这次影响重大的相遇中,瓦格纳和比他小二十四岁的科西玛相互承认了爱慕之情,并且——正如瓦格纳后来在他的《我的一生》中所写——在泪水和啜泣中立誓“我们相互都仅仅属于对方”。然而正是这一点在当时双方看来都是全然无望的。当瓦格纳还在准备一次新的前往俄罗斯的音乐会巡演,并指望能从中获得惟一的进帐时,他收到了音乐会取消的通

知。这时,他真的感到走投无路了。

这个五十岁的男人可能想到过自杀。无论如何他在给科西玛的信中写道(1864年3月10日于维也纳):“我想结束我的生命的这种痉挛,你已经感觉到了。从此我进入了最后一个痛苦阶段:我明确感觉到这一阶段马上就会过去。再做一次悲伤的最后的努力,就战胜它了。”

那段时日,瓦格纳的《特里斯丹》在维也纳的演出也被取消。由于他必须考虑到自己有可能因为拖欠债务而被拘留,在法律顾问的建议下,他离开了这个君主国。他在那里的债务总共为12100古尔登(德国古代金、银币名),折合成今天的钱约为10万马克。3月25日他到达了慕尼黑,在那里——如他日后所写——他在橱窗上第一次看到了当时十八岁的路德维希二世的相片。他在两个星期前成了巴伐利亚的国王。瓦格纳并不知道路德维希非常认真地阅读了他两年前出版的尼伯龙根剧作的前言。在前言中瓦格纳提到了两种可能性,它们可以资助他完成这一四部曲的最终作曲以及以后的巡回演出。

其中一种可能性是“热爱艺术的富有的先生女士们结成一个联合体”；另外一种可能性则是年轻的路德维希想要实现的，因为他对瓦格纳的音乐和著作仰慕已久。瓦格纳是这样描述他的设想的：

“相反，对于一个德国君主来说这是轻而易举的，他并不需要为此从国家预算中拨款，而只需拨用他的那笔一直用于维持最差的国家艺术机构的款项，即他那败坏德国人的艺术品位的歌剧院……会有这样的一个君主吗？——‘泰初有为’。”

瓦格纳完全没有想到年仅十八岁的巴伐利亚君主路德维希会接受这一浮士德式的挑战。他同样没有想到的是，国王已经派人寻找他。这位年届五旬的大师，此时在慕尼黑贫病交加。一次，在去“巴伐利亚农庄”宾馆的途中——他日后回忆道——以一种苦涩的自嘲口吻为自己赋了一首墓志铭：“这里躺着瓦格纳，他一事无成，/甚至未能作一个佩带最破烂勋章的骑士；/他引诱不出火炉背后的一只狗/吸引不了大学

课堂的一位博士。”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瓦格纳越过了波登湖，“又一次开始逃亡，寻求避难所”。在瑞士，在离苏黎士不远的玛利亚费尔德，他找到了一个住处，呆了几天。这是相识了数年的女作家伊丽泽·维勒的家。他对她说：“我的机质与人不同，有着敏感的神经；我必须拥有美、辉和光！我需要的东西，这个世界亏欠着我！我不能像你们的大师巴赫那样过一个贫困的管风琴师的生活！——如果要享有自己所喜欢的一点奢侈，难道就是一种闻所未闻的要求吗？这是我，我为世界和成千上万的人提供享受！”

然而之后他又变得默不作声，垂头丧气了。当她听了他的许多设想，想鼓励他还有一个光明的前途时，他教训她道：“您扯什么前途！假如我的文稿只能锁在柜子里，还有什么前途可言！该由谁来上演这个艺术之作？我，只有我，在幸福的魔鬼协作下，才能表现出它，让整个世界都知道，正是这样的，大师就是这样看他的作品，这就是他所想要的。”

在内心最深处他依然怀着希望。“一个善意的，真正能解救我的奇迹现在必须出现了，不然一切都完了！”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在另一封信中他叙述了自己居住在玛利亚费尔德时的一个梦境：“夜里我做梦了（在发烧）。腓特烈二世把我封为他宫中的伏尔泰。（我在他的日记中读到过。）可见我内在的野心。”

几天以后——此时瓦格纳已经到了斯图加特——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的内阁秘书拜访了他。他交给了瓦格纳一枚戒指、国王的一张画像和一份保证书，即他的君主出于对瓦格纳艺术的爱好而决定永远做他的朋友，帮助他摆脱不公正命运。瓦格纳刚刚还在同一个朋友说“我完了”，转眼却看到了所有希望的开端，而这个开端也确实奇迹般地改变了他的世界。他立刻写了一封短小的感谢信：

“尊贵、仁慈的君主！我向您呈上我无比感动的泪水，为的是要告诉您，诗一般的奇迹此刻如同一个神赋的现实在我可怜的、渴求爱的生命中发生了！——而这个生命，他最后的诗韵

和音符从现在开始属于您，我仁慈的年轻的君主：请您就像支配自己的财富一样支配它！”他的签名是“在至深的感动中，忠实而真诚的您的臣仆理查德·瓦格纳于斯图加特 1864 年 5 月 3 日”。

在瓦格纳满五十一岁的前几天，他在慕尼黑第一次见到了当时十九岁的路德维希。这位国王对他说，他应该完成他的尼伯龙根作品；它的上演不会有问题。此外也会有人去做安排，使瓦格纳脱离困境。“我感到如此幸福，以至于我被这巨大的幸福给融化了”，他在当天晚上写信给伊丽泽·维勒。他对路德维希的评价是：“他可惜是如此的英俊和通灵，心灵丰富，高雅尊贵，以至于我担心他的生命会像一个短暂的神之梦幻在这个卑劣的世界里转瞬即逝。”

不久，路德维希就在信中把比他大整整三十岁的艺术家朋友称为“我最深挚的情人”，“惟一和所有”，“我心灵幸福的化身”，“高贵的、神圣的朋友”，“生命之光的来源”，“最高的美好”，“生活的欢乐所在”，甚至是“赋予我灵性的救

星”和“热恋的情人，被祈求者，我生命的主宰”。与此同时，他还立足于现实。第一次见面仅过了五天，路德维希就让人先支付了艺术家 4000 古尔登，以使瓦格纳能解决他在维也纳的财政危机。4 个星期后路德维希又一次给了他相同数额的钱，让他从维也纳搬到施塔恩贝格附近的住所。此外，他还赠送了瓦格纳额外的 16000 古尔登。

从 1864 年 5 月 1 日起，瓦格纳的年薪为 4000 古尔登，相当于一个政府职能部门中级官员的薪水。半年后他的年薪又被提高到了 5000 古尔登。同年 10 月内阁财政部与瓦格纳达成了一个有关《尼伯龙根》的合同，规定为尼伯龙根的作曲瓦格纳将得到 3 万古尔登的酬金。而 1/3 的酬金作为定金马上支付给瓦格纳，他同时得到的还有他的年薪 6000 古尔登。

这真正的童话般的转折，使他一下子拥有了财富、安全感和影响力，瓦格纳生命的第六个十年，尽管它开始得如此悲惨，从此却走向辉煌。即便在现实里还出现了一些偏离这个新的

幸运的弯路（并非没有瓦格纳自己的责任），他依然在他五十到六十岁的年龄段里实现了许多计划和梦想。1865年《特里斯丹和伊索德》在慕尼黑首演，接下来1868年《纽伦堡名歌手》首演，1869年和1870年分别上演了《莱茵黄金》和《女武神》。

瓦格纳的私生活也有了一个幸福的转折。和科西玛的结合起初看起来毫无希望，而在这种背景下也最终得以实现。1865年，科西玛和瓦格纳的第一个孩子伊索德出世，1867年第二个孩子埃娃，（当时科西玛还是汉斯·冯·比洛的太太，并且仍然和他及他们共同的孩子丹尼尔和布朗第生活在一起。）自1868年11月起，科西玛与瓦格纳住到了一起；1869年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出世了，是个男孩，齐格弗里德，大家都叫他弗里德。1870年，在与汉斯·冯·比洛离婚后的第二天，科西玛与瓦格纳终于能够成婚。瓦格纳生命中幸福的第六个十年是伴随着一个新的开始结束的，这是一个新的巨大工程：1872年5月22日，他五十九岁生日那天，拜罗伊特剧院破土动工。



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

Hugo von Hoffmannstahl

1874—1929

“……而惟有男人是真实的生活者。他真正处在生活圈的中心，而这个生活圈把他牢牢地吸引在世界上，没有什么在他面前逃离，正如他也无法逃离任何事物。……”

真实的男人

——霍夫曼斯塔尔

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奥地利诗人，剧作家。写有短小诗剧《提香之死》、《白扇》等。长期与施特劳斯合作，有歌剧《玫瑰骑士》、《埃及的海伦》等。

诗人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 1874 年 2 月 1 日出生于维也纳，活到五十岁时，他已经非常有名，以至于比他小几岁的文化哲学家鲁道夫·潘维茨这样写道：“霍夫曼斯塔尔的五十岁生日应该作为当代德国文学的节日来庆贺。”而这位《每个人》、《伊蕾特拉》、《玫瑰骑士》、《没有影子的女人》、《纳克索斯岛的阿莉亚得内》以及其它许多作品（歌剧脚本，诗歌，散文）的创作者，在 1924 年 2 月 1 日他五十岁生日的那天，却并不快乐。相反，他非常失望，而且相当生气。原因看来是他的朋友鲁道夫·博尔歇特（一位如今几乎

被很不公正地遗忘了的诗人,其诗形式完美;同时是剧作家,叙事作家)主编的题为《爱诺斯》的庆贺篇章,它从各个角度赞美了霍夫曼斯塔尔的作品。博尔歇特附了一封信,将它寄到寿星在维也纳附近的罗道恩的漂亮家中:“不想给你打扰和愁闷,最主要……让你高兴和感动……我为这个机会感到美好和庆幸,以证明我对你深深的热爱和谢忱……”

然而霍夫曼斯塔尔根本就不觉得高兴和感动,反而恰恰感到惊骇,尤其是因为博尔歇特序言式的文章。这位朋友只用了简短的几句话回忆了过去的一段时光,因为“那个时候已经颇有名气的霍夫曼斯塔尔,对当时还默默无闻、也无可表现的”他“开始发生了一种不知不觉的鞭策作用”。就是这一段文字惹得霍夫曼斯塔尔十分生气。

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就是霍夫曼斯塔尔长期以来一见到将他后期的作品与他天才般的青年作品进行比较的文字就神经过敏,即便是隐隐约约的也不行。他的早期作品使他在高级

中学时就已声名鹊起，甚至将其以后的作品置于它的阴影之下。偏偏在他五十岁生日时，他感觉又一次有人对他的早期作品指指点点，而且这还是他最为看中的一个朋友。

经常有人说霍夫曼斯塔尔是个对于批评很不敏感的人，其程度令人惊异。所以，他现在责备他朋友的粗鲁态度就更加难以解释：“这一切都足以说明，”他在回信中写道，“把我定格在我的早期作品上，而我此后的创作成果，总而言之，不论是什么，则被粗鲁地、有意地忽略了，这已经成了恶意的、令人不快的文学作者的口令。你以天壤之别的观点在这里所做的……其效果是一样的……，涉及到对我整个创作的评价时，你的评判和措辞所有的巨大份量——都在天平上我的敌人那边……”

现在轮到博尔歇特，即便不是惊骇，最起码也是瞠目结舌，而无论如何他是生气了。虽然霍夫曼斯塔尔马上又表示他的信整个荒唐，并请求他的朋友谅解；他也的确使博尔歇特的火气有所消解，然而在他们的友谊中间，这一不和谐

音持续了很长时间,事实上直至最后,即5年后霍夫曼斯塔尔去世。

这一插曲明显表明,尽管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长期以来获得公认,功成名就,受到许多人的尊敬和爱戴,周围有一个很大的、同时也是有所选择的朋友圈子,但是他在五十岁时,却完全没有十年前曾经拥有过的那种感觉,没有那么安全、稳定、真实地立于生活的中心。而在十年前,他思索了不同的人生阶段,曾为男人表述道:“少年渴望生活,老人回忆着过去的生活……而惟有男人是真实的生活者。他真正处在生活圈的中心,而这个生活圈把他牢牢地吸引在世界上,没有什么在他面前逃离,正如他也无法逃离任何事物。最小的行为有着最广大的关联,臆想中已经战胜的东西不经意间又跳了出来,被浪费了的東西变成被欺辱了的,变得十分巨大并重新出现……每一个过去的事物都给自己罩上了一层薄纱,显现为一种永恒的当前。”

在他五十岁时,霍夫曼斯塔尔似乎感觉自

己已经很快地进入了一个男人的某个状态,这个男人已经越过了他生命力最旺盛的中期阶段。虽然他还有满脑子的想法和新的计划,还做很多工作,并且出门旅游,但是,他对环境的不安全感越来越明显。一种从他那非常胆怯、过于紧张的母亲那里遗传而来的对于天气的敏感,这时表现出种种令人担忧的迹象。他每天的状况——无论是愉快、轻松、可以工作,或者是失意、沮丧、无法工作——越来越多地取决于气压。在连续几周的雨天后,这个五十二岁的诗人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这几个星期我几乎元气大伤,就像生了一场病。”他越来越感到眩晕,有时候非常强烈,非常突然,以致于他必须立即平躺下来。

但是他还没有觉得自己已是一个白发老人;他同样把自己的老人阶段推向遥远的将来。另外,他还决定——如玛尔塔·卡尔维斯在她的《回忆霍夫曼斯塔尔》中所述——要成为一个没有好脸色的白发老人。她说,这一点,在以后的几年里他还向她重复过好几次,并且“半开玩笑

地”加以保证。此外“他发出‘没有好脸色’这个词时带有一种捣碎的快乐，就像一个男孩咬碎核桃那般”。霍夫曼斯塔耳这里所指的大约是：他，作为一直很自制、事实上始终无可挑剔地彬彬有礼的人，想通过这个拒绝式的、没有好脸色的态度获得一种面对日常生活的盾牌。

霍夫曼斯塔耳没有成为一个没有好脸色的白发老人，他根本就没能够成为老人。在他对天气的敏感越来越严重，对日常生活中每一件小事的恐惧心理几乎是病态地扩大之后，他的生命提前结束了。他的妻子——诗人和朋友鲁道夫·亚历山大·施罗德日后这样写道——“以30年如一日的忍耐和牺牲精神使他远离日常生活中无数的丑陋和难堪，或者他懂得如何去缓和它们，使之可以承受。”然而他不能驱走和缓解灾难。灾难于1929年7月13日降临：他的小儿子自杀身亡。第二天，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尔克哈特描述道：“昨天下午巨大的不幸降临罗道恩宅第。在一阵沉重的闷雷和暴雨中，我们可怜的弗兰茨朝自己的太阳穴开了枪。这一严

重行为的原因极其深刻：在于其性格和命运的深处。”

霍夫曼斯塔尔只比他儿子多活了两天。7月15日他在动身去参加儿子的葬礼时中风了。他再没有清醒过来，数小时后他在罗道恩自己的家中逝世。



路德维希·范·贝多芬

Ludwig van Beethoven

1770—1827

“你必须拥有一笔财富……，一个农庄也好，然后你就可以脱离穷困了……”

必须拥有一笔财富

——贝多芬

路德维希·范·贝多芬：德国作曲家，其创作集西方古典乐派之大成，开浪漫乐派之先河。主要作品有交响曲 9 部，钢琴奏鸣曲 32 部，弦乐四重奏曲 17 部。

“我可以这样说，我几乎一个人生活在这个德国最大的城市里。”这就是路德维希·范·贝多芬，1770 年 12 月中旬出生于波恩（17 日受洗，确切的出生日期没有存档记录）。他当时在维也纳觉得越来越孤单。他本来就不合群，也不是个适应性强的人，从 1798 年开始有了听力障碍，慢慢地他成了一个独行侠。贝多芬五十岁时已经完全失聪 2 年了。他的朋友，来拜访他的人，向他征稿的人，他的侄子卡尔，他经常替换的女管家和女佣，每个想和他说话的人，都把他们的意思写在贝多芬专用的对话簿里。从 1819 年到

1827年贝多芬去世,共有130本对话簿保存了下来。里面也包括许多贝多芬自己的记录,记述了他在日常生活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产生的越来越多的困难。贝多芬还在对话簿中记录了他购买的物品,写下了他经常和房主产生的不愉快,责骂那些往往令人不信任的、懒惰的女管家们,并且时不时地还为他的侄子卡尔祈祷。那是他哥哥的儿子,给他带来了很多烦恼。

在他哥哥死后贝多芬立刻申请对其侄子卡尔的监护权并得到了这一权利。贝多芬的嫂子,也就是卡尔的母亲,起诉反对贝多芬对其儿子卡尔的监护权。这一诉讼延续了4年。在贝多芬五十岁生日前不久,该诉讼才最终以贝多芬的胜诉告一段落。然而围绕着卡尔的麻烦事并没有因此而了结。卡尔起先想成为艺术家,之后又尝试了文学家、商人和官员,但都没有成功。为了使卡尔的生活有保障,贝多芬越来越节约了,甚至可以说是吝啬。他不惜利用一切手段积蓄必须的款项。为此,他收取出版商的预付款,却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完成相应的条件和义

务。他给自己壮胆去与他的出版商们做一种很有疑点的周旋：“你所有的作品出版日期的权利都不给出版商，同时伦敦和德国的出版商对此都一无所知，因为否则他们支付的钱会更少，而且也没有必要让他们知道。你可以借口说，另外有人在你这里预定了这个作曲。”——他在对话簿中这样对自己写道。

事实上他也试了用这种方法进行交易。有一次他把三个已经演出过的序曲作为新作品出售给他的英国出版商代理。最后东窗事发，出版商指示他的代理，以后再也不要买贝多芬的任何作品。

贝多芬这样做的原因也有一部分是他的失聪所引起的越来越慌乱的恐怖心理。他无法战胜这种恐惧。起先他还希望能够治愈。他从一本相关书籍中获悉这种疾病的治疗方法，对这本书的题目及相关方法他还作了笔记：“听觉疾病等等，等等。第10分卷。科隆1819。电子震荡器。通过增强电子达到效果。治疗顽固的风湿性耳鸣、重听和失聪。”



他的出版商们也都知道贝多芬的失聪。莱比锡的出版商认为,他似乎“对较为大型的作品,已经完全迟钝了”。有时候,贝多芬自己似乎对此也相当清楚,很害怕这一点,近乎于绝望。有一次他记录道,他想“结束生命;我觉得自己无可救药了。拯救你的惟一办法就是离开这里:只有这样你才能再次达到你艺术的顶峰,而现在你堕落于无耻的低谷中。再完成一部交响曲,然后就离开,离开,离开!”然而事实上他并不想离开这地方,也不想结束他的生命,而是希望进行创作活动。他还补充道:“这样你才能为你可怜的侄子作出伟大的作品……”

卡尔已经变坏,他只想利用贝多芬。他清楚地知道他可以“让他的叔叔为他做任何事情”。而贝多芬却越来越想念卡尔。他的三分之一的收入都花在卡尔和他的教育上。他记录道:“你必须拥有一笔财富……,一个农庄也好,然后你就可以脱离穷困了……”又突然像是在做祈祷:“让我活下去,即使是用救济金也行!只要能找得到它!”

那几年，他在精神上受到监护权诉讼的严重干扰、承受了极大压力，同时也了解到他的失聪无法救治。就是在这段时间，他创作出了《庄严弥撒曲》，并为此在他的对话簿中写道：“我认为那是我最伟大的作品。”另一次他又写道“那是永恒之作”。

五十岁的贝多芬也在经济上寄予了这部作品很大的希望。为了能最好地卖掉这部作品，他用上面已经提到过的方法与多个出版商进行商谈。他首先毫无保留地、坚定地同意把这部作品卖给波鸿出版商西姆罗克，并从中拿到了一笔相当可观的定金。之后，他还另外向5个出版商推销这部作品。他居然成功地以比原先和西姆罗克约定的酬金多出几倍的价钱定出了他的作品。当《庄严弥撒曲》最后完成时，贝多芬却没有将它给任何一个出版商，而是有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想法。他决定先不印刷出版，而是以手写的版本报价给他那个时代的大人物，每一手抄本50杜卡特（14—19世纪在欧洲通用的金币）。

贝多芬把手抄本寄给了德国大部分的侯

爵,还寄给了他们在维也纳的使者。同时,也寄到了巴黎和意大利的托斯卡纳。同时,他还亲自写信给一些富有影响的人物,请求他们为这部作品说话。他写信给意大利作曲家卢奇·凯鲁比尼,巴黎音乐学院院长;给出生于不伦瑞克的作曲家和指挥家路易·史波尔,他从1822年起就在卡塞尔任宫廷乐队队长;给卡尔·弗里德里希·策尔特,他刚刚在柏林成立了教堂音乐皇家研究所。他还写信给在魏玛的歌德。10年前,贝多芬给他寄了《艾格蒙》的配乐。此后不久,1812年7月,在坦布利茨的疗养地两人结识。同年9月他们在卡尔浴疗地又一次重逢。1822年5月贝多芬寄给他景仰的、不朽的歌德专为其诗作《平静的大海》和《幸福的旅程》的配乐,但是歌德对此没有任何反应。现在,1823年2月8日,五十二岁的贝多芬从维也纳给七十三岁的歌德写了一封感人肺腑的求救信:

“阁下,从我的青年时代起,我就一直生活在您永葆青春的不朽作品中,我永远不会忘怀在您身边度过的幸福时光。现在,也有一个机会

让我实在想唤起您对我的回忆——我希望您会收到我为阁下的《平静的大海》和《幸福的旅程》的谱曲。这两首诗,由于它们所显现的对比,在我看来都很适合、也能够用音乐的形式表现出来。倘若能知道我是否将我的和谐与您的和谐恰好结合起来了,我将多么欣慰啊。同样,您的教导我会视为真理,会特别欢迎,因为我爱她胜过一切。

很快就要有好几首我为您永远无与伦比的诗歌所作的乐曲问世了,《永不安宁的爱》就在其中。我将多么看重一个关于为您的诗歌谱曲或配上音乐的评论呀!

现在我向阁下提一个请求。我已写好一首大弥撒曲,但我还没打算发表它,而只是决定把它寄给最显赫的宫廷,酬金只要 50 杜卡特。出于这个目的,我已向魏玛的大公爵使馆提出申请,那里已经收下了给大公殿下下的陈情书,并答应转给他本人。这首弥撒曲也可以当作一部清唱剧来表演。而且,众所周知,如今的济贫协会需要同样的东西。我的请求是,阁下能够提请殿

下注意这件事,从而大公可能成为一位捐助者。大公爵使馆告知我,如果大公爵先作了表态,那将会十分有利。

我现在不再孤独了,6年来,我一直担当已故兄长的男孩的父亲。他是一个有前途的十六岁的青年,完全专注于艺术与科学。他已十分精通丰富的希腊文学。但在这些国家里,学这些东西是十分费钱的,而且对于年轻的学生们,不仅必须考虑现在,还要考虑未来。无论往常我怎样专注地只想高雅的东西,现在我的眼帘一定要垂下来——我的薪水几乎为零——因为多年来身上的疾病妨碍我举行巡回音乐会,使我不能抓住可能赚钱的机会。倘若我能完全康复的话,我可能还可以期待某些更好的状况。然而,阁下一定不要以为我把《平静的大海》和《幸福的旅程》题献给您是由于自己的需要,这件事早在1822年5月就做了,而那时候根本就没想以这种方式让弥撒曲问世。这只是上几个星期考虑的结果。从青年时代起,我对无与伦比的、不朽的歌德怀着的敬意和热爱以及尊重,那是难以

用言辞来表述的，特别是由一个像我这样笨拙的人，一个老是只想着献身音乐的人，完全是一种特殊的感觉在鼓动我，让我在您的著作中生活着，向您诉说这么多。——我知道您不会不为一个艺术家运用您的影响，他只是深切体会到纯的收益与艺术无关，他身不由己，为自己也为别人，去苦苦经营，去努力工作——好人对我们总是确信无疑的，所以我知道阁下不会拒绝我的请求。——您若给我只言片语将让我幸福满怀。——对阁下怀着最衷心的最无限的永不动摇的敬意的贝多芬 1823 年 2 月 8 日于维也纳。”

贝多芬显然是在身陷困境而急于求助的情感中写就的这封信，但他从未收到过歌德的任何答复。魏玛宫廷也对此表示沉默，没有订购《庄严弥撒曲》。尽管人们要为七十三岁高龄的歌德作开脱之辞：当贝多芬的书信寄到他在魏玛的家时，他正重病缠身，他的儿子奥古斯特和其妻奥蒂莉厄和他周围的其他人对他的病不抱什么希望。2 月 12 日歌德患上了心包炎，连医

生都似乎放弃了救治。然而这一切不足以成为他对贝多芬沉默的真正原因。因为在他生病的几星期里他的信件往来并非无人料理。一段时间以来，他的儿子奥古斯特已成了他父亲的秘书，他负责继续歌德的通信联系。而3月份歌德自己就重新接手了。他也可以在这个时候给贝多芬回信的。

但是早在一年前，1822年5月，他就对贝多芬寄给他《平静的大海》和《幸福的旅程》的配乐保持了沉默。这事蹊跷得很，因为当时五十岁的贝多芬并不是不出名或不被人重视；在那个时代，路德维希·范·贝多芬高高在上，被认为是该领域内最伟大的人物，也几乎完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早在1808年就已创作出《第五交响曲》、《第六交响曲》和《G大调钢琴曲》，1810年《艾格蒙序曲》，1811年和1812年产生了《第七交响曲》、《第八交响曲》。1813年和1814年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奏了他的《战争交响曲》和《欢乐颂》。在他创作完《庄严弥撒曲》后，他现在又致力于《第九交响曲》。第二年，他

五十三岁时,完成该曲。此后不到3年,1827年3月26日,贝多芬由于肝萎缩而过世。五十六岁的贝多芬还计划写一部《第十交响曲》,这个愿望最终未能实现。



奥托·冯·俾斯麦

Otto von Bismark

1815—1898

“人的尊严是人类最美的一面，保卫尊严是他的最高职责。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可以阻止人们反抗针对他的侮辱。”

与议员手枪决斗

——俾斯麦

奥托·冯·俾斯麦：普鲁士王国首相，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宰相，著名的“铁血宰相”。他通过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改革，使普鲁士王国迅速强大，并在普法战争中获胜，最终使德国统一。

1815年4月1日出生的奥托·冯·俾斯麦在步入第六个十年时，发出越来越多的抱怨：不满于过重的公务负担和不自由的生活。1862年9月起俾斯麦任普鲁士首相。当时他已经结婚，拥有三个孩子。1865年5月1日，他五十岁生日的一个月后，他从柏林写信给他的兄弟：“亲爱的哥哥，我来不来还很难说。每天我几乎找不出半小时时间用来散步或骑马……”四星期后，1865年6月2日，他又写信给他哥哥道：“我是在会议上给你写这封信的。魏尔肖正在发言，我

必须用半个耳朵听他的无礼之辞……”

五十岁时的俾斯麦情绪不宁且易怒。在此之前不久，他促使奥地利和普鲁士一起用武力从丹麦手中夺取了易北河北部所谓“不可分割的”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坦因公爵领地。与丹麦的战争最终以丹麦把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坦因，以及劳恩堡割让给奥地利和普鲁士而告终。但是不久，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又因为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坦因产生摩擦。显然，俾斯麦是准备好要和奥地利分裂的。“在政治问题上我是满意的……”，他写信给他哥哥，“和奥地利的关系开始僵化，分裂不是不可能的。”

俾斯麦认为，为争夺霸权地位，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的冲突扩张升级到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他没有利用一切可能来阻止这场“兄弟相煎”，反而还挑衅战争，因此树敌众多，并且不仅仅在那些自由党人中间，那些人从一开始就视这个波莫瑞（现波兰）大地主为危险的反动人物。俾斯麦毫不留情地镇压了势力增长的内政反对派。尽管如此，这些人还是让他很不安宁，

这表现在那个议会会议上，俾斯麦一边给他哥哥写信一边还得聆听魏尔肖的“无礼之辞”。

鲁道夫·魏尔肖比俾斯麦小五岁，是个享有极高威望的病理学教授，也是一个坚定的自由党人。他是由他参与成立的普鲁士议院进步党的主席。

1865年7月2日的会议的议案是——又一次的——武装力量的扩充；确切地说是海军的扩充。俾斯麦认为——同时他也明确地告诉大家——议院应该批准此举所需的经费，议员们对这一问题无须发表意见，而只需批准经费即可。这立即遭到了魏尔肖的强烈攻击：目前赢得的成果并不是俾斯麦的功绩，魏尔肖说，而纯粹只是偶然。如果没有一个确定的政治方案，首相只会让国家之舟随风飘摇。

对这一责备俾斯麦回答得十分巧妙：“魏尔肖议员责备我们见机行事，见风驶舵。现在我想问，行船时，如果不愿自己造风，那么除了随风转舵，还能怎么做呢？造风的事，我们让别人去做。”

而对魏尔肖的另一指责，俾斯麦的回答却不再这么幽默。魏尔肖呈上了一份委员会报告，是关于海军舰队的，并在议会上对此作了阐述。俾斯麦从总体上推翻了这一报告，说他简直无法理解，在整个报告中竟找不到一句对海军的称赞。魏尔肖反驳说，俾斯麦并没有将整篇报告读完；他又补充说，不然的话就确实不知道应该如何理解首相的公正了。

对方的这一番话让俾斯麦觉得受到了人格侮辱。他非常严肃的回答令议院惊讶：“报告人认为，如果我真的读过此报告的话，那么他就不知道该如何理解我对公正的热爱了。报告人先生已经在这个世界生活得够长久了，应该知道，这里他使用了技术性的和专门的措辞针对我，而藉此人们就把一场争执抛进了纯粹的私人领域，目的是强迫其公正性遭到怀疑的人对对方有个个人的交代……”

俾斯麦和魏尔肖的交锋以魏尔肖的宣言结束，他说没有必要收回他的话；议院会议则以驳回海军报告草草了事。此后，首相以各种方式要

求与魏尔肖议员用手枪决斗。

俾斯麦的决斗要求引起了强烈的轰动。国内、外的媒体都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在议院也不例外。福肯贝克议员,后来的柏林市长在下议院里表示:“如果首相侵害了议员的言论自由,并且要这位议员通过决斗来为他的表述承担责任,那么他就是对议院特权的一种严重的侵犯。”国防部部长儒恩则认为:“人的尊严是人类最美的一面,保卫尊严是他的最高职责。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可以阻止人们反抗针对他的侮辱。”

当时在普鲁士决斗还没有被禁止,然而也不是没有限制。1843年以来(根据普鲁士内阁条例规定)由名誉法庭从军事名誉的立场出发为军官决定决斗的理由是否成立。但即使是有理可据的决斗也要受到惩罚。如果决斗双方能幸免于难,决斗者将被判以6个月的堡垒监禁。把对方杀死的决斗者将被判以4年的堡垒监禁。

这一规则是为军官设定的。然而大家可以

想象：普鲁士五十岁的首相和他所挑战的议员会因为一个对两人来说都是幸运的决斗结果而在堡垒中被监禁数月！或者就是其中的一个受伤或被杀？！俾斯麦引出了一个不可能的情形。

该事件后来被调停。俾斯麦被国防部部长说服了，决斗是不可以进行的。魏尔肖的党内朋友也令他对此坚信不疑。

将近一年后还是有人朝俾斯麦开枪了。但并不是因为决斗，而是发生在1866年5月7日柏林市菩提树下大街上的一次刺杀行为。当俾斯麦步行从国王宫殿去他在威廉大街的办公楼时，突然听到背后有枪响。他转身，看到几步之遥有一个年轻人，拿着手枪正对准他。俾斯麦急中生智扑向这个青年，用一只手抓住了他的右手臂，另一只手掐住了他的脖子。被俾斯麦扼住咽喉的刺杀者瘫倒下来。俾斯麦后来叙述道，他当时认为自己即刻也要倒下了，因为有一瞬间他有一种被致命击中的感觉。事后发现，子弹穿过大衣和外套，到了衬衫就停住了。当行刺者——图宾根学生费迪南德·科恩·柏林特，他

当天晚上在监狱里自杀身亡——被抓获押走时，俾斯麦走回家，准备向他的妻子报告这一袭击事件和结果。他走向她，吻了吻她的额头，说：“别怕，宝贝！有人朝我开枪，但是上帝保佑我，我没有受伤。”

他们家的一个朋友，在俾斯麦回家时碰巧在场，叙述了这个场景。后来，这个朋友说：“很多回我都有这种感觉，他自我感觉是上帝挑选出来的为祖国谋福利的工具。”而威廉皇帝好像也相信五十一岁的俾斯麦就是上帝挑选出来的首相。这一事件后，俾斯麦觉得比前几年更强大。在刺杀事件几个星期后，普鲁士对奥地利的战争爆发，普鲁士获胜，把奥地利从德意志帝国大本营中驱逐出去，从而确立了普鲁士在帝国中的统治地位。通过吞并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坦因、汉诺威、黑森、拿骚和自由城市法兰克福，他使普鲁士的领土和人口扩大了大约 1/4。五十五岁时，他还挑起 1870/71 年的德法战争，这场战事以抓获拿破仑三世，战胜法国而告终。普鲁士——德意志辉煌的顶点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建

立和七十一岁的普鲁士国王最终坐上了德国皇帝的宝座。

这一辉煌是在公开宣称的和平意义上实现的；由俾斯麦起草、并由他在凡尔赛宫镜厅里宣读的公告最后是这样结尾的：“上帝赐予我们和我们的后辈成为皇帝的臣子，德意志帝国随时扩大者，不是进行战争侵占，而是为了和平事业，为了民族的幸福、自由和文明。”

这位帝国的开国元勋被尊为君王，获得汉堡附近的萨克森森林作为礼物。5年前，五十岁的俾斯麦男爵刚被封为伯爵；他用一笔馈赠钱款购买了瓦钦的庄园。现在，他又购置了弗里德里希鲁。尽管他有着丰功伟绩，但是他并不幸福。五十五六岁的他依旧感到疲劳过度，他那神经质的易怒情绪也越来越严重。在一封信里他向妻子埋怨：

“帝国的诞生是一个难产，国王们在这种时候只有奇异的欲望，就像妇女们幻想留住即将分娩的婴儿。我作为助产士多次感到有种迫切的需求：变成一个炸弹爆炸，让这整个的建构化

为废墟。令我不堪承受的并不是必要的事务，而是那些无稽的纠缠。”

无论如何他是高高在上的。新帝国最有权势的人不是德国皇帝，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最权重显赫的是帝国宰相，同时兼普鲁士首相：奥托·俾斯麦公爵。他现在正成为欧洲最有权力的人物，一直到他将近七十五岁时被推翻下台。此后，他退隐到弗里德里希鲁，在那里心怀不满地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 8 年。



特奥多尔·冯塔纳

Theodor Fontane

1819—1898

“……是为了一种表面上的安全稳定而过一种麻木的、没有光彩也没有欢乐的生活，还是选择从前的那种不安全，但至少可以为我自己赢得重获开心时光的可能性。……”

选择幸福生活

——冯塔纳

特奥多尔·冯塔纳：德国作家，
曾任德法战争中的战地记者。代表
作品有《埃菲·布利斯特》、《施特希
林》等。

俾斯麦在他生命的第六个十年里已真正达到他创造力的顶峰，目标明确，卓有成效，尽管不失抱怨，而他小四岁的同代人特奥多尔·冯塔纳却与他截然不同。冯塔纳五十岁时，事业上还一无所有。尽管他已是一家之主，但养活妻儿对他来说却是一件很难的事。他们最小的孩子才四岁。他只有极少的时候有一份稳定的收入；他根本就无法忍受固定地被雇佣，去服从上司的命令。

冯塔纳 1819 年 12 月 30 日出生于诺伊鲁平，他父亲在那里开了一家“狮王药店”。为了按照父亲的意愿继承药店，他选择了主修药剂学。

然而，当他结束学业时，他父亲已经没有药店了。老冯塔纳把药店和另外一小部分财产赌光了。于是 T.冯塔纳只能在这个行当里从做助手开始，收入很差。因为他不喜欢这份工作，不久便尝试着做其它事情，但是那些工作同样不怎么适合他。有时候他梦想着能够做一个博物馆管理员或火车售票员。他开始为报纸写稿，反响平平。之后，他成了驻外国通讯员，去了伦敦几年。

在这期间他结婚了。当时他还不满三十岁。他的婚姻给他带来了 7 个孩子，维持了几乎 48 年，但并不总是幸福的。他妻子和妻子的家人很难理解他为什么不能忍受任何一份工作。因为他们的缘故，冯塔纳不断地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他做过园艺协会的秘书，教师，后来又重新做编辑和通讯员，做图书管理员。有一段时间他还考虑过去军队里当药剂师。然后，他四十二岁时，进了柏林的《十字报社》的编辑部。1864 年至 1866 年战争期间，他作为战地记者为这家报社工作。他的报道不久之后便编成了书出版，

他的系列文章《马克·勃兰登堡边区纪行》也编辑成册了。但是这些书没有让他挣到多少钱。

所以当他告知妻子爱弥尔·冯塔纳他辞了报社的工作时，她非常生气。她是在伦敦停留期间接到丈夫的长信的，冯塔纳在信中表述了他的理由。在这封日期为1870年5月11日的信中他写道：

“贤妻吾爱……三个星期前的今天你动身出发，而现在到了我早就想好的要向你透露我们的秘密的时刻了。我放弃了报社的工作。别晕倒。但愿你还没读完这封信时就会说：他做得非常对……首先我要告诉你，在这三个星期里我没有一刻为我的决定和我的行为方式后悔过。相反，我每天都为此而感到高兴。这一点对你来说肯定也是重要的。”

在接下去的文字里冯塔纳大致讲述了他辞职的经过。一个主编批评了他的一篇文章，“他说话彬彬有礼，但是非常冷漠……”，“我撇撇嘴，站起来告别。还没走到办公楼的大门，我就决定，再也不踏入编辑部一步”。冯塔纳写了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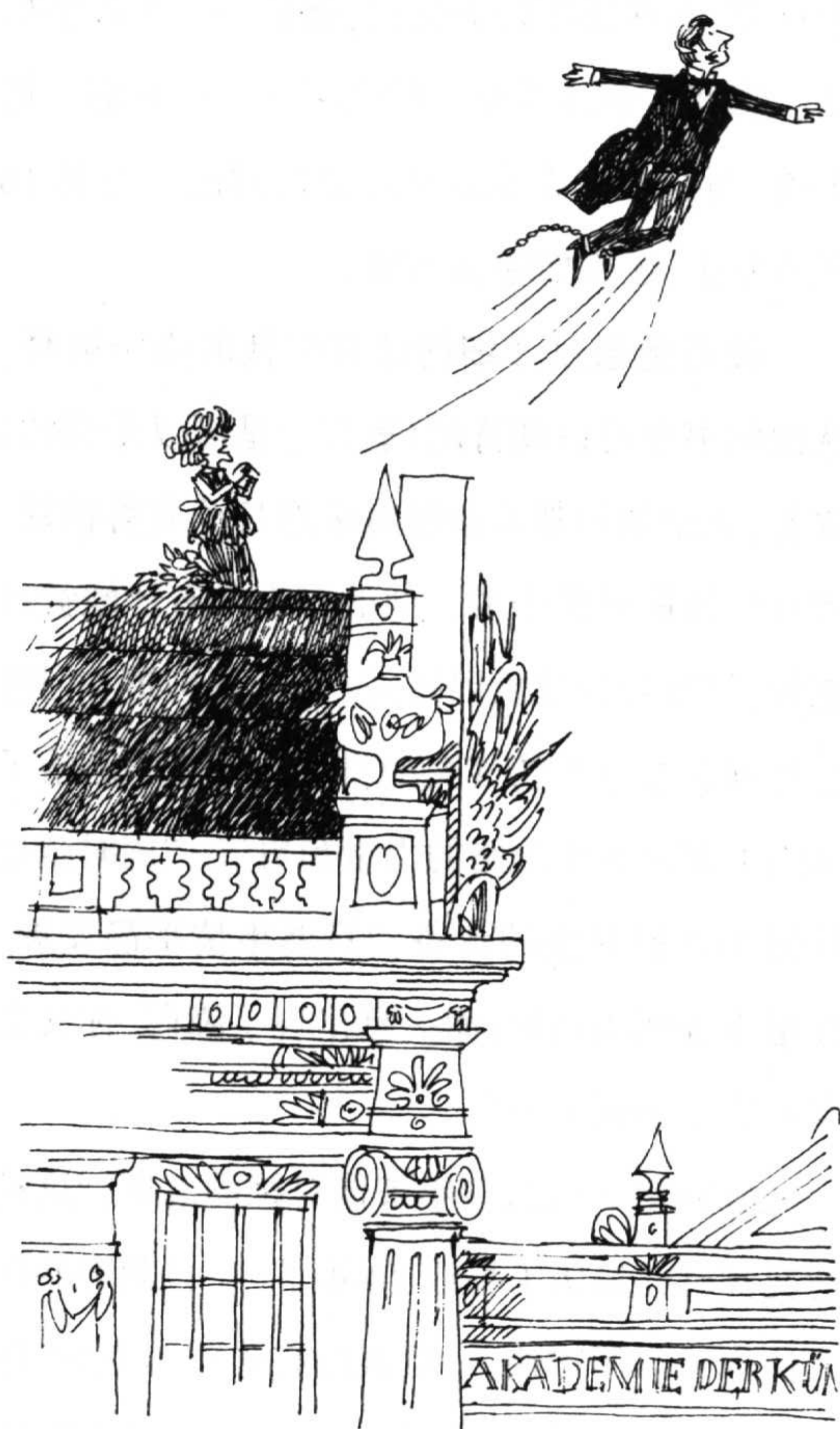
职书。当他作出决定时,还有人请他把事情再考虑清楚。在给妻子的信中他是这样阐释他的立场和决定的:

“你知道,我早就决心用这种方式来行动了。我再也不能忍受这种粗鲁,这种粗鲁在于肆无忌惮地利用我们的自由和精神力量,而没有谨慎地人道地顾及我们旧有的日常生活。一想到这一点,我就感到愤怒……我当时对自己说:现在你还是一个被人认可的、能为报社增光彩的人物,还是报社一个小小的骄傲,就有人敢对你说这种冷漠的训斥性的话;那么10年后,当你可能已经成了一个负担时,别人又会怎样同你讲话呢?那个时候他们会用你根本无法忍受的言辞,而六十岁的你又穷又没地位,被撇在一边。这种情形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它在所有的生存关系中都会出现;所以,鼓起勇气,面对这整个状况;现在你还精力充沛,还能在上帝的帮助下战胜它;你还可以开辟完全崭新的、幸福的生活,这一刻在向你走来;如果没有什么新的,幸福的机会在你面前展现,那么你也没有失去

什么；你若不是又一次步入那些实质上并不比报社差，有些还更好的位置，就是——在最糟糕的、感谢上帝还不至于的情况下——面临一场灾难，而这个灾难你迟早总会面对的。与其 10 年后发生，还不如现在出现。”

接着他通过详细的计算向他的妻子解释，从他的书中可以期待的（事实上是可以希望的）收益，无论如何都不会使将来的日子变得糟糕。她在给他的回信中说，他的行为没有让她觉得吃惊，但也没让她感到高兴。她祝愿他道：“但愿这种现在使你神清气爽的自由的感觉，能给予你走上新的人生之路的力量和勇气。”同时她也丝毫不吝啬对他的责备：“只要事情平静发展，你是幸福而满意的；而一旦出现了障碍，你又会弃一切于不顾……”

她回忆了这么多年来他对她的态度：“这种情况我已经经历了将近 20 年了。一旦我有些什么让你觉得不愉快，一旦我站在你的对立面，你就抱怨这是一个 20 年之久的、难以忍受的婚姻。你与你的朋友们相处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们



总是一再地向你聚集,而不是你向他们靠近。你在这三星期里没有一分钟对你的行为后悔过,这对我并不是一种安慰;你为你的自由开心了,也没有缺钱的感觉,我痛苦的感觉没有让你难过,你的朋友们也不曾有抚慰你开心的笑脸。他们很可能不同意你的行为;他们中的每个人在各自的处境都有必须承受的事情,而你处在自由中,这只能以其它的牺牲来换取。上帝保佑这个牺牲不要太沉重!你一病数月的情形至今令我痛苦,让我没有勇气去面对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然而尽管有疑虑,她还是明确表示愿意和他一起承担他这一决定的后果:“现在我得尽自己的义务,快乐地和你站在一起,帮助你。只可惜我们两个人的健康状况不适合我们从头开始;但是人一旦需要力量,它还会出现的……”

但这对他来说却是远远不够的。五十岁的冯塔纳似乎感觉到自己不仅被妻子的批评和怀疑态度所击中,而且是被她看透了。不然的话,他不会对她的信作出如此强烈的反应。他再次

替自己辩解，在回信中写道：

“女人有一种总是回到她们最初的言辞的美德，你就非常杰出地拥有这种天赋。尽管如此，我现在还是要对我的头几行文字作几句补充。傻瓜才会相信能够表达出具有说服力的词句。我在老罗泽那里呆了4年半，在英格兰4年，在报社干了10年；我必须离开莱比锡和贝塔尼恩，尽管我很希望多待些时间——对自由和变化的强烈执著究竟在哪里是归属！不管怎样，我确有这种癖好，但我置其于我的判断和理智之下，后两者根本就是我的生活和行为方式的调节器。如果你以为，我是因为要改变，因为一次小小的争执而放弃了一个安全可靠的终生职位，那我不该生气，是的，‘生气’这个词语气太轻了。我放弃的是一份从外面看起来还冠冕堂皇的、而其实质阴险不忠的工作。这份工作目前只能维持我一半的生活，然而——10年后——在我长期的忍气吞声之后，因为伤害是不可避免的，就根本不能养活我。这就是我作出该举动的决定性因素，是个非常冷静的决定，但

是这么重要的一点你却置之于不顾。当然我也可能盘算得不对,但是想来不至于如此,但愿你能(当然未如我愿)能够再次认识到,除了仁慈的上帝,我们的生存更多地建立在我焕发的精神和创造热情之上,而不依赖于你的不祥预言,这些预言至今为止——证据很明显——每次都成为羞辱,并希望再次成为羞辱。到目前为止你没有因此达到任何目的,除了一点:在困难时刻将我本已艰巨的任务变得更为艰巨,因为你从来也没有使任何担子减轻过。你的特奥。”

14 天后,在又收到妻子的一封信后(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他缓和语气道:“亲爱的妻……不要以为我会责怪你一定程度的忧虑;我们大概永远也不会走出这种警惕小心的状态了,因为每月只有 40 塔勒,从事着一个德国作家的行当,这一类情况是很难排除的,问题只在于,人们如何承担忧愁,承受这种不断的绷紧神经的状态,是被它完全击垮,还是逐渐建立这个信念:‘上帝一直在帮我们,也会继续帮下去的!’……”

接着他又给他的妻子估算了一遍，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如果他找不到新的工作，将会怎样：“如果，这是可能发生的最极端的事情了；我们最终必须完完全全、直接依靠我的写作所获生活。到现在为止，我只每天晚上，还不包括深夜，工作，这笔收入就大约有 1000 塔勒。或者谦虚地说有 800 塔勒；你难道不认为如果我整天伏案写作的话，就有能力使这个数目翻倍吗？那么就有 1600 塔勒了。那么现在你还是觉得我们有为这件事再争执的必要吗？你不觉得这笔钱无论如何都已经足以让我们体面而尊严地生活吗？这就是最重要的一点了，独立是至高无上的。其它的都是废话……”他结束这封信：“如果我们的失败不是上天安排好的，那么我们就不会走向灭亡。你永远的老 Th.冯。”

冯塔纳一家没有走向毁灭。不久以后，1870 年 6 月，有人请他为在柏林出版发行的《福斯报》写皇家剧院的评论。该报社的戏剧评论家去世了。冯塔纳接受了这一职位，几乎 20 年之久他都是戏剧评论家。然而这份工作并不能给他

带来足以养活自己和家人的可观的收入。事业开展得也很缓慢。当德法战争爆发时,冯塔纳和他的书籍出版商约定写第三本战地日记,他去了法国的战争现场。在一次去圣女贞德的出生地栋雷米的途中,他因涉嫌是普鲁士的间谍而被捕。尽管他身上有非战人员的证明,但由于他身带手枪和手杖剑等武器,法国人不相信他。这样,冯塔纳来到了奥莱龙岛上。

在此之前——像人们一再描述的那样——他从一个监狱转到了另一个监狱,然后就被关到了这个岛上。这里看上去,用他自己的话来形容,是这样的:在指挥部,“一切更像是世外桃源,像一个牧师的住房,而缺少指挥部的‘军事气息’。有人把我介绍给指挥员,福罗上尉。他请我跟他进他的房间。在那里我被介绍给几个女士认识。在她们中间有一位漂亮的、有着金色头发的、才刚刚结婚的阿尔萨斯女子,她坐在女主人旁边,其真正的、默默约定的任务是与每天新来的犯人交往,作翻译,但是,福罗上尉向我透露说,她利用各种方式逃避这种任务,她宁愿把

她的时间用来‘上午写信,下午哭泣’。他又说:‘实在是令人气愤,发生在蜜月里的战争,能想象比这更气人的事吗?’我们还闲聊了一些其它的……中间有人拿上来了几瓶斯特拉斯堡啤酒,年轻的阿尔萨斯女人介绍了她家乡的啤酒,我则在6个星期之后第一次重新产生了对啤酒的渴望。这是一种很一般的产品,然而,不管怎样总归是啤酒,主要成分里有那种强化神经的苦涩原料,于是我觉得我是在喝健康。福罗上尉不久就卸下了他的面具,转而用一种与他那优雅、可爱的天性最契合的声调和我幽默地开起了玩笑。他的主要调侃对象是那位透着寡妇幽怨的金发女郎;接下来便是我了,我得任由他模仿浪漫主义取笑。但我很乐意,很乐意又听到他那亲切的、舒适的语调。‘先生,’他结束其玩笑道,‘我看到您将会怀念奥莱龙岛上监禁经历;您将赢得一个很好的素材,使您将来的传记增色。’”

在此期间柏林已经有不少人在为冯塔纳获得自由而作努力了。1870年10月29日普鲁士

首相，奥托·冯·俾斯麦亲自写信给在巴黎的美国使者(冯塔纳对此一直一无所知。):“我尊敬的先生! 根据可靠消息,普鲁士的一位臣民,也是有名的历史编撰者,冯塔纳博士,在法国的德占区进行科学考察时被捕,被押送到了贝藏松,存在着生命危险。为此我请求您慈悲为怀,正式向法国政府要求释放他,并明确说明,如果法方拒绝释放的话,我们将会法国的一些城市逮捕一定数量的与冯塔纳博士地位接近的人押送到德国,对他们实施与冯塔纳博士在法国所受的相同的待遇……”这不是一句空头威胁。国防部长已经让人逮捕了三名法国学者作为人质。

12月初冯塔纳又回到了柏林。在奥莱龙岛上他已经完成了他的《战争羁押》一书的一部分;圣诞节期间福斯报社开始提前印刷。对他同时代的人而言,这本书太缺少战争气息。在书中人们感觉不到对敌人的仇恨和普鲁士德国的优势。他的另外几本写1870/1871战争的书在许多同辈人看来犯有同样毛病;1875年当他的第70本战争书最后一册出版时,书的销售情

况极差,从同行那里没有得到任何认可。当时五十五岁的冯塔纳的生活和婚姻又陷入了新一轮的危机。

起先,他仿佛终于有了一份可靠的工作,这是他妻子 25 年来为他(更为了自己)所期盼的。通过朋友的介绍,他接受了柏林艺术科学院的常任秘书的工作。这份同时有枢密顾问的候补资格的工作收入可观,意味着他终于得到了一份物质上的保证。然而,虽然工作花费时间不是很多,冯塔纳也不用每天去部里办公,他却从一开始起就不喜欢这份工作。他觉得他的上司不友好。仅仅过了 2 个半月,他就递交了辞职申请,她的夫人十分震惊——直接原因是与上司的一次争执——8 周后这份辞职申请奏效,他被解雇了。这不仅让他的妻子,而且让他的朋友,尤其是那些帮助他获得这份抢手的、受人尊敬的国家职位的朋友感到无法理解和接受,甚至愤怒。在给比他大九岁的友人,生活在多博汀贵族女院的玛蒂尔德·冯·罗尔小姐的信中,冯塔纳对他的决定做了解释:

“人不能违背他内心最深处的天性。在每个人内心都有某个东西，一旦它感觉到了厌恶，那它是既不能平息也无法克服的。我必须在两者之间选择。是为了一种表面上的安全稳定而过一种麻木的、没有光彩也没有欢乐的生活，还是选择从前的那种不安全，但至少可以为我自己赢得重获开心时光的可能性。我选择了后者，而我的妻子要求我选择前者。如果我不是猜想，她是用那句著名的日常法则来安慰自己的话，那么我会视她这个要求为一种极端自私的行为。日常法则曰：人会习惯一切的。然而这句话根本就是错的。我不是那种敏感的人，但勿庸质疑的是，无数人，无论年老或者年轻，都会因为忧伤、渴求和受伤害而心碎。每天都有这样的实证：人并不能习惯一切。而我也做不到这一点，如果必须要我承受这些，那我即使不会变得忧郁消沉，至少也会发生可悲的转变，从充满活力到僵化木讷，从精神活跃到精神呆滞。这当然就叫做‘习惯’了，但是多么可怕！”

他的辞职给他带来了许多麻烦。此外还有

失望,因为有关部门对待他十分小气。他被强迫付还两个月的工资,尽管在最初的两个月里他进行了无偿的工作。“部里知道我现在没钱,而且必须在我的旧有状态中再一次从头开始,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心安理得地要回我11月和12月的工资。这实在太气人了。”

他还向贵族女院冯·罗尔小姐报告他的日常生活安排:“白天我坐在书桌前发奋地工作,晚上我去剧院看戏或阅读书籍,或绕着动物园跑上两个小时。我远离了一切交际,在这整个冬季我既不想去拜访任何一个人,也不想邀请朋友……”

在这一时期冯塔纳致力于他早先已经开始写的长篇小说《暴风雨之前》。在他1876年11月1日给玛蒂尔德·冯·罗尔的信中写道:“对,那部长篇小说!它现在是我在这一绝望的时间里惟一的幸福,我惟一的休养。在写它时我忘了那些令我感到压抑的事情。如果还有幸让它问世,那么,在回忆它产生的这段时间时,我会说,这是一个令人忧虑的孩子。但是他没有忧虑的

影子；在许多地方他都是开朗的，没有受到任何不幸的折磨……在写作过程中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作家，只能在这一美好的职业中——由那些膨胀的自命不凡者笑话好了——找到我的幸福。”

冯塔纳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暴风雨之前》，以 1812/1813 德国反对拿破仑的解放战争开始时的柏林为背景，出版于 1878 年。当时冯塔纳已经五十七岁了。在放弃了艺术科学院的工作后，他就完全只做确实符合他的天赋，同时也给他带来乐趣的事：他写长篇小说和其它各类小说，其中他晚年的作品《埃菲·布利斯特》和《施特希林》最为有名。作为作家，他没有得到那种并不常见的幸福，即不仅被自己同辈的同事，也为尚年轻的作家完全认可。



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1483—1546

“我们的生命大约有
70 年；如果长寿些，那就是
80 年，如果这是非常美好
的一生，那就在于努力和工作……”

努力和工作换来美好一生

——路德

马丁·路德：16世纪欧洲宗教
改革运动发起者，基督教新教路德
宗创始人，公布《九十五条论纲》，
将《圣经》翻译成德文。

1483年11月10日出生于图林根艾斯莱本的马丁·路德五十岁时已经完成了最本质的工作。他翻译的第一个圣经全集《圣经，用德语这一神圣的语言写就》(1534)出版时，这位改革家正好刚满五十岁。很久之前他提出著名的论纲反对当时实行的赎罪法（并不是根本反对赎罪）；罗马教皇对路德的诉讼，宣判将他革出教会；沃尔姆斯的帝国会议，在那里路德为自己的文字进行辩护，拒绝认错，从而被剥夺了法律保护权；在瓦特堡的日子，从《新约》开始把《圣经》翻译成德语；农民战争中路德站在与起义农民对立的立场上撰文并作祷词。宗教改革，这场由

他引发的教会—宗教运动，突破了天主教会的一统天下，促成了伴随着新的宗教团体而来的新的宗教态度。这一改革的影响越来越大。新教徒的数量不断地增加。然而宗教改革没有涵盖所有的德意志国家。德国在宗教上从此四分五裂。

诗篇第 90 篇中有一节，路德的翻译使人们把工作理解为人生活中具有永久价值的一部分。在德国的新教地区，人们也完全是这样理解的。经过路德的翻译，这一处成了最受欢迎的、被引用最多的《圣经》话语：“我们的生命大约有 70 年；如果长寿些，那就是 80 年，如果这是非常美好的一生，那就在于努力和工作……”

但是路德在这里翻译错了，或者至少是不够准确，于是这段话就可能被人错误地加以解释。事实上，诗句作者的意思恰恰相反，即整个人生不外乎是辛苦和受难，即便是那些他在短暂的尘世生活中曾经感觉的美好事物。这一节一再地被误解为对工作的最高礼赞，与《圣经》

第一卷中的一处形成鲜明的对比，那里人被从天堂中，从无忧无虑的逍遥自在的永恒存在中驱逐出来，因为他的罪孽而被诅咒，并受到必死和终生劳作的惩罚：“用你的满头的汗水换取你的面包……”

此间，路德翻译的诗篇第 90 篇已经经过了多次的修改。例如在 1907 年至 1931 年译出的《苏黎士圣经》中是这样翻译的：“（我们生活中）大部分是辛苦和艰难。”1979 年出版的《圣经》的“统一译本”也作了极为类似的翻译：“其中最好的只是辛苦和艰难，/很快一切都会过去，我们转瞬即逝……”在《路德圣经》修改版中（1965 年以来已经如此）则明确无误地译成：

“我们的生命只有 70 年，
如果长寿些，那就是 80 年，
而其中似乎十分美好的，却不过是
徒劳的苦干……”

生活在以色列后期的诗篇作者想表达的是对生活的悲观和失望。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人们

一直在盼望，盼望长久以来就有预言的解脱时代的到来，而这美好时代的好处就是人们不再需要进行徒劳的努力。因为这时生命中所有的不幸都将被克服。

人们只需要把整个诗篇第 90 篇放在上下文中读一遍，就会发现路德的解释是站不住脚的。诗篇是在上帝面前对人的易逝及其短暂而辛劳的一生苦涩的控诉：“你一声愤怒，我们的这一生就搭进去了，我们就像结束一声叹息结束自己的生命……”悲情在请求中达到高潮：“主啊，看看我们吧！/可怜可怜你的奴仆们！一早就赐给我们你的仁慈吧！/我们就会欢呼，日日都欢欣鼓舞。”

到那时！而不是现在，作者认为，现在人类还一直处在苦难、欺骗和劳累不堪的工作重压之下，即使是生活中美好的东西实际上也只是徒劳的努力而已。也许，一生都在艰苦工作的马丁·路德不愿意这么看。他或许是故意这样翻译诗篇第 90 篇的，好让人们把工作理解为生活中的美好事物。无论如何，他的译文与比较正确的

译文而言对许多必须工作的人来说是一种无尽的安慰。



列夫·托尔斯泰

Leo Tolstoi

1828—1910

“好，你将拥有千百顷的土地和数百匹马；你将比世界上其他的诗人和作家都更著名。然后呢？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它能给你带来什么呢？”

完全改变生活

——托尔斯泰

列夫·托尔斯泰：俄国作家、思想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

出生于 1828 年 9 月 9 日的俄罗斯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在他五十岁时也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虽然青年时代懵懂无知，毫无目标（他早年就失去了双亲）。他起先想学东方国家的语言，后又尝试学习法律，随后作为中士参军，参加了克里米亚战役，最后他从事了写作。他离开部队（当时二十七岁），以一个庄园主的身份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也有部分时间生活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在他还是个军人时他就开始写作并发表了文章。例如他自传性的小说《童年》，随后又有《少年》和《青年》问世，以及——作为他在高加索和克里米亚

岛上的经历记录——《袭击》和《塞瓦斯托波尔小说集》，后者使他跻身名家之列。

三十四岁时，在去瑞士、意大利、德国和法国旅行回来后，他与十八岁的苏菲·贝尔斯结婚。她为他生下3个孩子，并誊抄了他那大部分难以辨认的、几经修改的草稿。他那著名的长篇小说的草稿《战争与和平》写了5年之久，而她却抄写了7次之多！

托尔斯泰五十岁时，除了《战争与和平》和多部短篇小说及描写作品外，他的长篇，反映俄国60年代社会风貌的《安娜·卡列尼娜》也已经问世。当时列夫·托尔斯泰已享有世界声誉。他拥有一个大家庭，一个大的庄园，相当富裕。所以，虽然这个五十岁的作家陷入生存危机并不是一夜之间的事情，但他妻子对此的确毫无思想准备。突然之间，他对至今为止的整个生活产生了疑问。他坚信自己做错了一切，生活的意义也整个颠倒了，还认为他的生活到此为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五十岁的托尔斯泰写下了他的《忏悔录》。该书在俄罗斯首先以书写体的手抄

本流传,5年后他才将它印刷出版。

在《忏悔录》中他这样写道:“我为之生活的,已经不复存在。我没有任何生活的动力……对任何一个希望我都说不出一个理智的理由,看不见生活作为整体的意义……只有当人们痴迷于生活时才能活着;人一旦清醒,就会不可避免地看到所有的一切都只是欺骗,只是愚蠢的欺骗……我就像是一个在森林中迷了路的人,惊骇于自己迷了路,四处乱撞,想找到自己的路。我知道我走的每一步只会使我越来越迷惑,但尽管如此我还是必须四处寻找。这实在是非常可怕。为了使我能从这种可怕中解脱出来,我希望自己能自杀。”

在认识到必须过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时,他先十分夸张地谴责了自己早年在军队里的生活:“每当我想起那几年,我就会震惊、厌恶和羞愧。我在战争中杀人,并鼓动别人决斗,好杀了他们。我玩牌赌输了大量的钱,靠农民的劳动生活,惩罚他们,生活放纵,欺骗别人。谎言、抢劫、嫖妓、通奸、酗酒、冲动、谋杀——没有一种坏事

我没有干过。尽管如此,人们还表扬我的行为。我的同辈人过去和现在都把我视为一个相对有道德的人。这样,我活了10年之久。在此期间我出于虚荣、贪欲和骄傲开始了写作。”

但是此后的年月,即他作为一家之主以及取得辉煌成就的那些年,在他眼中也成了空虚的、毫无意义的了。他的大女儿塔佳娜,当时十四岁,后来回忆道:“我父亲认识到,在他身上发生的是一个受致命内伤的人发生的事情。他觉得必须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他必须知道他做一件事的原因,无论是写一本书,或是抚养他的儿子,还是得到一块新的庄园地。他对自己说,‘好,你将拥有千百顷的土地和数百匹马;你将比世界上其他的诗人和作家都更著名。然后呢?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它能给你带来什么呢?’”

五十岁的托尔斯泰似乎陷入了要结束自己生命的危险。他在《忏悔录》中这样写道:“黑暗的恐惧太可怕了,我希望尽快用一个绳套或一颗子弹解脱自己……我对自己说,一定有些东西搞错了,但是我不能发现究竟错在什么地方。

很长时间以后，黑暗中才开始透出光明，我逐渐地认识到我的处境。”

但在刚开始的时候五十岁的托尔斯泰是相当迷惘和无助的：“我觉得自己脚下被抽空了，所有曾经属于我生活的东西现在都已不复存在。我也没有任何什么可能帮助我活下去的东西了……我已经走到了感觉自己——尽管我是一个富裕而健康的男人——活不下去的地步……所以，尽管我有表面的幸福，却不由自主地藏起一段绳子，为的是不让自己有上吊的可能性——在我房间的两个柜子之间，也就是我每天晚上一个人换衣服的地方，架着一根横梁；我也放弃了打猎，为了避免用如此简单的办法结束我的生命……”

托尔斯泰随后认为能够在最真实的基督教信仰中找到生命的意义所在。为了把自己献身于神学和新教，他放弃了——无论如何最初的阶段——他原来的文学创作。“我父亲去莫斯科马卡宁主教那里，”塔佳娜写道，“参拜了圣塞阿盖修道院，又步行去了奥普金修道院。”他也

去了基辅，他觉得——如他自己所说——被这个地方吸引。但是当他到了那个著名的修道院时，他给他妻子写信道：“从清晨一直到下午三点钟我观看了大教堂、地下墓室，拜访了僧侣们，但是这次参观让我很不满足；这趟旅行不值得。7点钟我到了拉夫瓦修道院……这次我没有获得什么有用的东西。”

但是托尔斯泰并没有放弃，而是继续自己独立的钻研。回到自己的庄园后，“他把所有的精力都倾注到一部巨著中，”塔佳娜在书中写道，“他重新翻译了四福音书，对它们进行比较，并且作了……惟一的一篇文章……为此他必须学习希腊文和希伯来文。”

那个时候，比托尔斯泰年长大约 10 岁的作家伊凡·屠格涅夫来拜访他。他对五十岁的托尔斯泰的转变相当吃惊，并写信告诉他的朋友说：“列夫·托尔斯泰不写作了，这实在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罪过……在同时代的文学中他是独一无二的。所有被他攫取的，都能在他的笔下鲜活起来。他的创造力是如此博大——真是让人难以

置信。但是现在又能拿他怎样呢？他一头扎进了另外一个领域：与几乎所有语言的《圣经》和福音书打交道，写了一大堆文字。他有满满一箱子的神秘主义伦理学和各种伪阐释。他给我读其中的几段文字，我完全不懂其中的含义。我对他说，这里面恐怕有些什么东西不对劲。‘这是惟一正确的。’他回答说……看样子，他好像不会再为文学作什么了，或者假使他再回来，也会带着他的那个箱子。”

对此比屠格涅夫感受更直接的是托尔斯泰的家人，尤其是他要求他们以后要简单朴素地生活，而不能像已经习惯的那样奢侈。首先是他的妻子不愿意跟着他进行这种突如其来的转变。塔佳娜的回忆录中说：“是他培养了他的妻子……他曾经是那个只让她坐头等舱旅行，为她和孩子们在最贵的商店里买高档的衣服和鞋子的人。现在，他却要求她和孩子们像农民一样生活吗？……为什么？为什么现在突然要把充满欢乐和闲适的生活换成一种充满辛劳和贫困的日子？这些是我母亲所不能理解的。”

越来越折磨他的，是他物质上的富裕；他把自己拥有的一切视为罪孽，因为其他人生活在贫困中；他想倾其所有馈赠给他人。“把我的所有给予他人，”他写道，“并不是为了做什么好事，而是为了使自己的罪孽减轻些。”他开始把钱分给穷人。但是这让他妻子惊慌：“列夫新的思想观念同样体现在他的一个突发的倾向上，即大量送人钱。”她写道，“我试着让他明白，在赠送时要稍稍注意方式，至少应该知道，送给谁，为什么。但是他坚持这么做，并且用福音书中的一句话对我说——给那些乞求你给予的人。”

她希望，他对个人财富的拒绝会像一种疾病一样地过去。但情况并非如此。这位五十四岁的作家——在此期间托尔斯泰和他的家人曾经搬到了莫斯科——志愿当了一名人口普查工作人员的助手。他明确地请求分派去最贫困人生活的城区或者是收容无家可归者的救济院。他的结论是，这些人之所以生活在贫困里，是因为其他人丰衣足食，生活富裕。他女儿日后回忆

道：“他从夜间收容所回到家，看到桌子已经铺好：橙子、糕点在洁白的桌布上熠熠发光……两个忙碌的仆人照顾着年幼的、懒怠的男孩。他眼光所到之处尽是帷幔、地毯，用这些布料可以做成 10 个人的衣服。他的心在疼痛中抽搐，继而怒火中烧。他不能忍受我们在这种闲适和安宁中生活，而处于一箭之遥的贫困的人们却走向死亡。”

托尔斯泰也对此写道：“一个人，如果他没有限制自己消费他人的劳动成果——这正是另外一些人往往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所得的成果——，反而提出更多的要求使那些人更辛劳，如果他还有些良心和理智，他怎能安心过他的生活？”

他试着以他自己的方式生活。“他改变了自己的习惯，”他妻子在给她姐姐的一封信中写道，“每天都有一个新的变化。7 点钟，天还是漆黑一片时，他就起床了。然后他用一个小雪橇拖一个巨大的圆木桶在身后，去取水以供家用。他把木头锯下来，用斧头劈成木条，然后整齐地堆

放起来。他不再吃白面包,也从不带它们出门。”

在他妻子还一直希望他的这个“危机”会很快过去时,生活对他来说越来越难以忍受。他觉得自己不能彻底改变生活。托尔斯泰写信给他的朋友:“在农村我感觉到了一种压抑。我们这种不正常的生活,对穷人的剥削,我都清楚地看到,我们怀着如此天真的无知所进行的这一切,尤其让我痛苦。我经常这么想,谁能忍受这种痛苦到最后,谁就能得到拯救。为什么?我不知道。尽管这些毫无意义,我还是期望有种东西可以让我从我的生活和我的良知的这种明显的反抗中解脱出来。”

两种对立,信中所描绘的以及他与妻子之间的矛盾冲突,每天都在增长。在五十四岁的托尔斯泰认为他再也无法忍受她时,在他妻子和他之间发生了激烈争吵后——塔佳娜叙述道——“一天晚上他背了一个乞讨袋离开了家。”“我看着他穿过桦木大道走出视线。我还看见我母亲坐在家门口的树下。她的脸因痛苦而扭曲。她那深邃的、张大的眼睛凝视着远方的空

虚世界。她还站了一会儿,已经觉出了第一回阵痛。那已是午夜时分。我哥哥伊利亚走近她,小心地陪她进了房间,扶她上床。接近凌晨我的妹妹亚历山德拉出世了。”

托尔斯泰还是在这个夜晚,在他们的第 12 个孩子亚历山德拉出世之前回来了,并向他妻子道了歉。然而基本的情形并没有改变;这种矛盾,他为之深深痛苦的矛盾,并没有消解。他妻子也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作为母亲她比从前更多地考虑到她的孩子们将来所需要的物质保证。所以,他们夫妻之间的分歧一再发生。塔佳娜记录了这样的一次争吵和它对孩子们的影响:“我记得那个恐怖的冬夜。那个时候我们是 9 个孩子。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形。我们几个年长的坐在一楼门厅的椅子上等着。时不时地,我们还走到楼梯的最低一阶,那楼梯通向二楼我父母说话的房间,竖起耳朵捕捉他们的声音的细小声响。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尖锐,语调中充满了激动之情。我父母之间发生的一定是难以调解的、决定性的矛盾。没有一个人

愿意退让一毫米。每个人都在为比他们各自生命更重要的东西辩护：对她而言是孩子的幸福，她认为那是她的幸福所在；他则为他的精神辩护。——她爱她的孩子爱到发疯，爱到身体发痛；他爱真理甚过爱一切。我们虽然没有完全理解他们的话语，但是我们已经听得够多了，也早就知道他们之间到底是为了什么而争执。”

“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他说，“这样奢侈、闲适地生活。我不能在我认为有害的条件下继续参与孩子的教育。我不能再做一幢房子和一个庄园的主人。生活中的每一步对我来说都是无法忍受的痛苦。不是我走，就是我们改变生活；把我们的财产分掉，像农民一样靠我们的双手劳动养活自己。”她反对道：“如果你走，我就自杀，因为没有你我就无法生活。至于要改变我们的生活作风，我没有这个能力，我不想这样；我不理解为什么，为了遵循这种莫名的神经质的可怕想法而非得破坏这种幸福的生活方式。”争执陷入了恶性循环，总是不断地回到相同的不可逾越的、无法解决的那个问题上。

五十多岁的托尔斯泰知道自己所面对的的确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他的确非常严肃地想要彻底改变他的生活。但他不是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而是和他的大家庭一起。如果他认为，整个家庭也必须过另外一种生活，那么这样一种改变就必须在强制下才能成功，而这又违背了他的想法。塔佳娜写道：“他不责备任何人，也不教训任何人……甚至于不给任何人以忠告。”她猜想：“或许他害怕强迫我们什么，害怕强力影响我们的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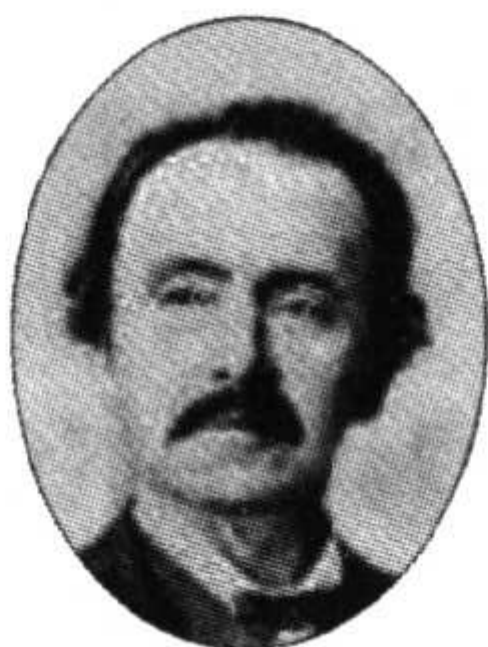
托尔斯泰也没有强迫自己去做他认为正确的事情。或许他只是找不到出路。他最终又转向文学，一部分是伊凡·屠格涅夫的原因。屠格涅夫临死前在卧榻上给托尔斯泰写了一封信，恳请这位俄罗斯的大作家回到文学之路上。托尔斯泰接受了他的劝告，但是他从此以后创作的作品——其中《伊凡·伊里奇之死》、《克莱采奏鸣曲》、《复活》、戏剧《黑暗的势力》和《活尸》——，都在传达他的宗教-道德思想。他自己也陷于他的思想和现实生活所构成的矛

盾之中。

在八十二岁时，他说：“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八十二岁我才开始明白人应该怎样生活，才能使生活不断地享有一种乐趣。”然而他是真的明白了吗？同年，在一个夜里他离家出走了。在他离开亚斯亚纳·波尔纳亚庄园之前，他给妻子写了一封告别信：“我的出走会让你痛苦，我为此感到难过，但是你要理解并且相信，我没有其它的选择了。我在家的情形已经令人无法忍受。另外，我不能再像我以前那样奢侈地生活，所以我做出了像我这样年纪的老人习惯做的一件事：为了在寂寞与和平中度过他们生命的最后时日，他们离开了现世的存在。——请你理解这一点，不要来找我……感谢你这48年来与我患难与共。如果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请你原谅我，就像我在内心最深处原谅了你可能对不起我的一切……”

八十二岁高龄的托尔斯泰几天后在火车上突然发烧了。肺炎使他的旅行不能继续。在阿斯塔波沃这个小火车站他不得不在巡道工的家里

卧床休息。就在那个火车站，列夫·托尔斯泰于1910年11月7日离开人世。——仍不是他所希望的孤独或不为外界所知。许多记者，摄影师和电影摄影师来到这个偏僻的火车站，还有他的家庭成员，当然还有他的妻子，但是医生不允许她和托尔斯泰说话，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就已远远超过了他的承受能力。甚至在教会身居要职者也赶了过来，他们想让八十二岁高龄的托尔斯泰临死前回到东正教教会的怀抱中。但是他们再也没有机会了。



海因里希·施利曼

Heinrich Schliemann

1822—1890

“看看我的发掘成果，
每个人都会承认我解决了
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因
为我发现了在原始古老的
土地上，在一座古老的城
市深处的高度文明和巨大
建筑。……”

生命才刚刚开始

——施利曼

海因里希·施利曼：德国考古学家，曾在希腊和小亚细亚发掘特洛伊遗址，“米尼亚斯宝藏”遗址及迈锡尼遗址。著有《特洛伊及其遗址》、《迈锡尼》等。

有一个人，他虽然不是一直到五十岁几乎都在读书学习，却是至此都在为他的事业做准备，为他——如他自己所称——从孩提时起的梦想：海因里希·施利曼。施利曼 1822 年 1 月 6 日出生于梅克伦堡的诺布卡。他从 1871 年起开始在土耳其的希萨里克山上发掘，在恰好五十岁时有了第一个成果，他希望自己发现了真正的特洛伊城，那个荷马传说中的伊利昂，普里亚摩斯国王曾经统治过的城市。1872 年 8 月 14 日，在这第一次大规模的挖掘工作接近尾声时，施利曼写道：

“看看我的发掘成果，每个人都会承认我解决了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因为我发现了在原始古老的土地上，在一座古老的城市深处的高度文明和巨大建筑。这个老城在整个古代被称为伊利昂并充当特洛伊的后继者，它在当时整个文明世界中的建筑基地与荷马史诗中的伊利昂建筑相吻合。这座城市的位置不仅在每个方面都完全符合《伊利亚特》的所有注释说明，也符合我们通过后辈作家叙述所熟悉的所有的传统……”

施利曼觉得他的生命才刚刚开始。他现在开始做的，的确是一项崭新的事业，即他作为考古学家的工作。

至此为止，事实上他一直都只是挣钱，学习语言。他十岁时被迫离开家乡的村庄，因为他父亲，一个新教牧师，被错误地怀疑贪污了教会的钱财而罢免了职务。在他父亲平反后，年少的海因里希回到了他身边——母亲已于几年前去世了。

因为没有足够的钱去中学读书，他先在一

家小杂货铺当了 5 年半的学徒和帮手。十八岁时,他决定到委内瑞拉去碰碰运气。那里有一个汉堡商人,是他母亲青年时代的朋友,愿意给他提供一份工作。

在路上他遇到了船只失事。双桅小帆船沉没了。施利曼逃难到了荷兰。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家贸易公司他谋到了一份跑腿的差事。施利曼体质瘦弱多病,尤其是在他学徒期间生过肺病之后。但是他有着惊人的精力。在阿姆斯特丹 3 年的跑腿生活中,他共学会用 6 种语言书写和会话:荷兰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葡萄牙语。于是,另外一家公司雇他为通讯员。在他学会了俄语后,这家公司就派他去了圣彼得堡。在那里,施利曼马上就自己做起了靛蓝、钾硝、硫磺和铅的贸易。他二十六岁时就已经是一个百万富翁了。

然后他去了美洲。在 6 星期的旅途中他学会了波兰语。而在此之前他还学会了瑞典语。他在淘金城萨克拉门托开设了当地第一家银行。他把淘金者找到的金块和金粉换成美金,从中

获取巨额利润。2年后他回到了俄罗斯,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他的生意特别兴旺,于是他便背上了“发战争横财者”的名声。之后他离开了该公司去旅游:突尼斯、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西土耳其和雅典,最后到了西班牙。后来他又去了突尼斯和埃及,还有印度、爪哇岛、中国、日本和美洲。在一篇游记《从中国到日本》中他记录了自己的旅游印象。然后,他作为旁听生在名声显赫的巴黎索邦大学注册上学,那时他已经四十多岁了。为了争取能被录取,他请求法国教育部长给他一次特殊批文。他成功了。他报名听的课程有:现代语言和文学、法国16世纪文学、彼特拉克和他的旅行、比较语言学、阿拉伯语言和文学、希腊哲学、希腊文学和埃及学。

他想扩大他的知识面。同时,这一内容丰富的学习计划表明,在那个时候施利曼看起来还没有想到从事考古事业。但是,在他的自传中,施利曼声称当他还是个小孩子时,就已经下决心,将来要去探寻由荷马史诗而出名的特洛伊城,并要发掘它。只是出于这个原因,他才用了

半辈子还多的时间挣了这么多钱，为的是能够在经济上独立地从事考古工作。事实上，这种说法只属于施利曼的传奇版本，是他自己营造的，并从此之后一直被人传说下去。或许，他是想用一个小高尚的动机来为他的冒险发迹，为他这个成功的、同时也经常是不择手段的商人脸上贴金。在给他出版商布洛克的一封信中，五十五岁的施利曼曾经这样表述：

“尽管我父亲从来没有达到那一种境界，去读荷马的著作，但是他对荷马所塑造的英雄非常感兴趣。每天给我们讲他们的英雄事迹，但是又不无遗憾地指出，特洛伊城被完完全全地破坏了，没有剩下一砖一瓦。——我起先对此还深信不疑；但是 1829 年圣诞节我得到了《圣经故事》插图本作为礼物，那本书呈现了一个熊熊燃烧的特洛伊，它那巨大的城墙和显赫的城门，埃涅阿斯背着他的父亲安喀塞斯，手中牵着他的儿子阿斯卡尼俄斯从城门中逃出来。那个时候我开始怀疑父亲的说法了。我对他说，那些城墙只是被埋没了，但永远都不可能消失。这一坚

定的信念在我所有的人生变迁中从来没有改变过。我们关于特洛伊的争执总是以我的许诺——等我拥有足够的资金后，要把特洛伊挖掘出来——而告终。”

事实上，施利曼对考古的兴趣并非从少年时代就产生了，而是在他人到中年才开始苏醒。这并不是一个始终不渝的愿望和计划，如他后来所描述的那样，而是更为偶然，不完美，但也更符合人性。

施利曼在大学的学习因为他的多次旅行而中断。在四十多岁时，他第一次去了希腊旅游，期间他还去了西土耳其，参观了那里的自然风光，也就是后来发现特洛伊的地方。他以关于此次旅行的一份报告获取了罗斯托克大学的哲学博士头衔。那时他已经四十八岁了。当时他与他的第一个妻子离婚了。然后，快五十岁的施利曼在雅典又与非常年轻的索菲娅·恩加斯托门诺，一个希腊女人结了婚。她积极地参与了他的考古工作。和索菲娅一起，五十一岁的施利曼在1873年在特洛伊发现了著名的普里亚摩斯宝

藏。

这无疑是他特洛伊发掘工作早期的一个高潮。这一宝藏的发现不仅给他带来了世界声誉，同时也产生很多的不愉快，因为随之而来的是与土耳其政府之间关于占有关系问题的旷日持久的争执。很奇怪的是，施利曼从来没有讲明确切的发掘地，可能是为了避免盗墓者的光顾。对发掘地他进行了如下说明：“在普里亚摩斯宫殿附近”，在一堵墙内。但是他详细地描述了找到的物件和如何完好保存它们的。他把工人们送到了埃森，以便于能够独自一人埋藏这些宝藏，也就是——用他自己的话说——“打消人们对宝藏的贪欲，拯救我们的科学事业”。1873年6月17日他有如下报道（这里只选取片段）：“在我的工人们吃饭和休息时，我用一把较大的刀把宝藏取了出来，而做这件事实在需要费很大的力气，必须承受最可怕的生命威胁。因为我就是在那么厚重的堡垒墙下挖掘，它随时都有可能倒塌下来……如果没有我亲爱的妻子的帮助，我是不可能把这宝藏取出来的。她总是站在

我这一边，把我取出来的东西包到她的围巾里带走。

第一个找到的物件是一个大的铜制的盾牌……我拿出来的第二件物品是一个有两个水平把手的铜锅……直径 42 厘米……第三件物体是一个 1 厘米厚、16 厘米宽、44 厘米长的铜盘，它有 2 毫米高的边；在铜盘末端还看得到两个不能活动的带轴的轮子……第四件取出来的物品是一个 14 厘米高、直径 11 厘米的铜花瓶。之后则是一个 15 厘米高、直径为 14 厘米、403 克重的球形瓶，用纯金制成……；然后是一个 9 厘米高，7 又 $\frac{3}{4}$ 厘米宽，226 克重的杯子，同样是用纯金制成。接着是一个 9 厘米高，18 又 $\frac{3}{4}$ 厘米长，18 又 $\frac{1}{4}$ 厘米宽，恰好 600 克重的用纯金制成的杯子，形状像一艘船……在这些金、银制品的上面和旁边我共发现了 13 个长矛。”

施利曼认为，所有这些物品都是在匆忙之中放入一个长方形的木箱中的，“就像《伊利亚特》提到的在普里亚摩斯宫殿中发生的那样”，使宝物免遭特洛伊城堡上已经引发的火灾的袭



击。他进一步解释他的观点：“我在这些物件旁边随即发现了一把 10 又 1/2 厘米长的铜钥匙，这就更证实了我的猜想。”

他继续道：“可能是普里亚摩斯家族中有个人在紧急之下把这些珍宝装进了一个箱，带着它逃走，都没来得及把钥匙拔出来。但他在城墙上落入敌手或被大火截住，就只得丢了箱子。箱子即刻被旁边国王府邸的红土和砖瓦掩埋，上面堆了有 1.5 米或 1.8 米厚的砖土。”

“这个不幸的家伙，”施利曼继续猜测道，有可能也是“几天前在国王府邸的一间屋子里被发现的物件”的拥有者。即一个铜盔和“一个高 18 厘米、宽 14 厘米、凸肚的银花瓶，在花瓶里有一个 11 厘米高的雅致的杯子。”

对被施利曼称为是最大的银花瓶，他出人意料地没有进行详细的描述。在这个花瓶里他发现了那些著名的饰物，后来他的妻子戴着饰物让人拍过照。他形容这件宝物道：“2 个熠熠发光的金色的额环，1 条额饰带，4 只漂亮的、具有高度艺术美感的金耳环……；在它们上面有

56 只形状各异的金耳环,8750 个小金戒指,穿孔的棱柱和立方体,金纽扣等等。它们显然来源于其它的饰物;接着是 6 个金镯子,最上面的是 2 个小金杯……幸亏那个想保护这个宝贝的人头脑冷静,把装着上述珍品的这个大银花瓶垂直地放入箱内,于是没有一颗珍珠掉落下来,一切都得到了完好的保护……”

对于一部分起先对他持非常怀疑的态度、相当长一段时间保持低调的专业学者来说,这次发现足以证明,施利曼在寻找特洛伊的过程中从一开始就走对了路子。他开始挖掘时,还有许多人猜测荷马的伊利昂,特洛伊人的城堡不在希萨里克山,不在这个现在挖掘的地方,而是在继续往西南方向的布纳尔巴什村。施利曼毫不怀疑他所找到的宝物属于特洛伊传奇般的普里亚摩斯国王的财产。但是施利曼错了。“普里亚摩斯宝藏”比施利曼以为的要早差不多 1000 年。施利曼挖穿了他所寻找的特洛伊,在这个过程中深入到了古老得多的历史层面。

海因里希·施利曼十分渴望得到承认,尤其

是来自科学界的承认，而给予他赞誉的更多的是国外的机构，而非德国。五十四岁的他成了伦敦文物学会的荣誉成员。虽然第二年他也被授予“德国人类学、民族学和史前史学会”的荣誉成员，但这要归功于他与病理学家鲁道夫·魏尔肖的密切合作，后者是该学会的创立者之一。在随后的几年里他发现了迈锡尼，阿伽门农之城，被荷马誉为“黄金王国”的城市，在那里，五十四岁的施利曼发现了第二件，比在特洛伊发现的还要大许多的黄金宝物；也是在迈锡尼，他证实了他独自の、与同时代的古代研究者的观点相背的预言。尽管他取得了这一系列考古学方面的重大成果，德国的考古学家们依然对他不予认可。而他后来又在泰利安继续作出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那里，已迈入了人生的第七个十年的施利曼与建筑师威廉·多普费尔德共同挖掘，作进一步考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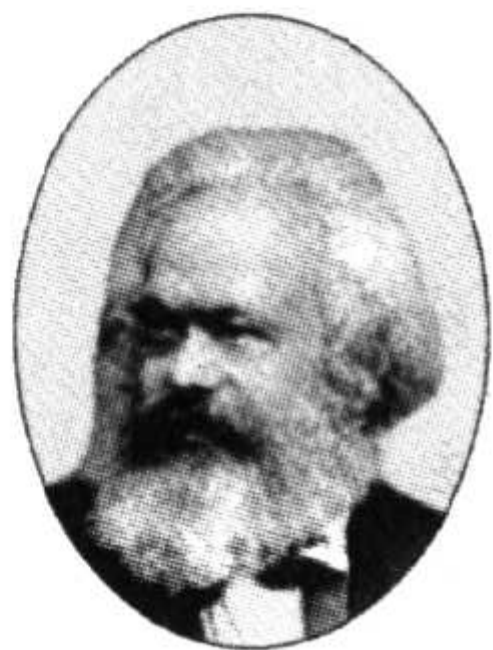
1881年柏林市授予五十九岁的施利曼荣誉市民的称号，这虽然是一个极其光荣的称号——从1808年起只有另外39人获得过该荣

誉——但是柏林市并不是心甘情愿地做这件事的。当施利曼把他考古发掘所得的大量收藏,包括“普里亚摩斯宝藏”,这一与土耳其政府进行了无休止的诉讼之后才获得的宝物,赠送给德意志帝国时,他提出了这一颁奖作为条件。他还为此提出了其它要求,但没有得以实现,例如为他妻子颁发一枚勋章以及——对他来说这是值得努力的——成为普鲁士科学院的成员,那是一个享有最高声誉的科学家们极为推崇的机构。就连为施利曼协商谈判的魏尔肖也不愿意在这件事上与他合作,并且告诫他:“您不是为了获得荣誉才把您的收藏交到柏林去的。”施利曼此外还想获得普鲁士勋章,一直利用他的收藏作为要挟。他向外国,例如向不列颠博物馆、卢浮宫、那不勒斯国家博物馆和圣彼得堡的艾勒米塔吉博物馆提出要出售他的收藏品。

施利曼直到死后才得到来自德国专家学者方面的承认(他在将近六十九岁时在一次耳朵手术后逝世),但这时他也只是作为一个考古爱好者普及了这门科学知识而受到肯定。1891年

3月1日，在施利曼捐赠其收藏10年和他逝世1年以后，柏林市政厅举行施利曼纪念活动，会上，奥林匹克的第一个发掘者，考古学家恩斯特·库齐乌斯——施利曼多年来一直希望与他建立联系而终未如愿——在他的讲话中说：“曾经有过一个崇尚书本学究的时代，其高深的造诣完成于书斋里，它突出地表现在古文化的研究问题上。我们的施利曼为打破这个框框作出了最关键的贡献，这也正是他的巨大功绩所在。如今，人们可以经常听到，对充满了莱辛、温克尔曼，赫德尔和歌德精神的时代及对古典文化的浓厚兴趣熄灭了。然而大洋两岸整个文明世界却充满热情地追随着施利曼的脚步……”

此外，在二战末消失的“普里亚摩斯宝藏”，如今又在莫斯科重新出现。



卡尔·马克思

Karl Marx

1818—1883

“我让妻子拿给我看所有的账单，债务数量比我想象的要多得多……”

不会理财的经济学理论家

——马克思

卡尔·马克思：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和领袖，科学共产主义的奠基人。重要著作有《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

五十岁的海因里希·施利曼早就已经非常富裕，他再也不用为钱发愁(最多只需考虑有效地进行投资)，而1818年5月5日出生的卡尔·马克思在他五十岁时还经常陷入对他来说特别典型的财政危机，而且一生都无法摆脱这种困扰。这不仅仅是他不幸的境遇造成的，即马克思从三十二岁起就在英国流亡的事实，更主要的原因是这个经济学的大理论家，根本就不会理财。或许他也根本就没有理财的愿望，根本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他的朋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与他一起于1847/1848年写了《共产党宣言》“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从他五十

岁起到他逝世一直都在帮助他，或者应该这样说，养活他和他全家，即他妻子和他的众多孩子，还有一个和他们一起生活的家庭佣人。

恩格斯生活在曼彻斯特，他从父亲手上继承了一家工厂。在马克思五十岁之前恩格斯就一再地解救他于经济困境中。马克思为美国、英国、奥地利和德国各家报社写文章，凭着他的报刊文章、政论文、散文和其它所挣的钱远不足以养活一个那么大的家庭。从 1844 年起马克思就（即使偶尔有中断）致力于他政治经济批判的经济理论著作。当马克思五十岁时，第一卷出版了，题为《资本论》，发行了 1000 本。

之后不久马克思又一次陷入财政危机。他考虑是否搬家到日内瓦，因为在那里生活要比伦敦便宜。但是他先给恩格斯发了求救信号：出于各种原因他急需一笔钱。其中一个原因是，他妻子和他们的女儿在拉姆斯盖特度假，她们身边的钱不够用了。而马克思一直都非常注重给别人以体面生活的印象。1868 年 8 月 13 日他写信给他的朋友恩格斯：

“亲爱的弗里德,我希望你还能在出发前读到这封信。因为实在是火烧眉毛了。

首先我必须往拉姆斯盖特汇一笔钱,这样她们还能在那里待上一星期。由于她们在你的上一次汇款后数星期才出发,所以家政费用又有些增加。另外,我妻子必须去当铺取回她的表和其它物品,这样她才能体面地在疗养浴场活动。

第二,我欠了一个小商贩 6 英镑和几个先令,这个星期我必须付清,因为这家伙要把他的店铺关了。

第三,我已经因为国税而收到过两次警告函了。城镇税,如你所知,已经付了。这笔钱我完全不能再拖了……你的 K·M”

比马克思小两岁的恩格斯立刻回信给他的“黑人”,因为马克思深色的皮肤,恩格斯喜欢这样称呼他(而马克思则用绰号“弗里德”戏称恩格斯):“亲爱的黑人,我明天给你寄钱。今天下午我们的出纳一点钱都没了。不要因为‘挤压’而不好意思,我只是但愿能够多挤压点出来。你

要知道,6个星期后我们必须偿还那 150 英镑连同利息。博尔克海姆说,算上利息一共是 165 英镑!我想,你应该为你去荷兰作好决断了。我们不能去借这样高的利息……你的 F·E”

几个月后,恩格斯给了朋友一个建议,即每年给他一笔固定的钱以供使用。这样马克思,就可以安心地写他的《资本论》的第二卷。他请求马克思说出欠下的债款,并问他每年 350 英镑是否够用:“亲爱的黑人,认真考虑一下,尽快答复我,这样我就可以在星期二早上得到你的回答。

1. 你需要多少钱来还清你的债务,这样你就可以从此无债一身轻?

2. 350 英镑能否够你一年内正常的、一般的需求(排除因为生病和不可预知的事件所引起的其它花费)。也就是说,你这样就不必欠什么债。如果不行,那么告诉我你需要的数目。前提是,你所有以前的债务已经清偿。这个问题当然是主要问题……”

恩格斯想卖掉他的工厂,然后把钱进行如

下分配，即他可以靠它生活——可以自由地开展他作为作家的政治性工作，尤其是他与马克思的合作；因为马克思也必须依靠这钱过活。他写信给马克思说：“卖掉这家工厂可以让我有能力每年给你 350 英镑，这样可以保证 5—6 年，在特殊情况下当然还会给你更多的钱。但是你要知道，如果时不时地又堆积起一大笔债务，得靠其它的资产进行偿还的话，我的努力就会毁掉。”

马克思满怀感激之情接受了这个建议，但又不得不承认：“我让妻子拿给我看所有的账单，债务数量比我想象的要多得多，210 英镑（其中大约有 75 英镑是用来赎回典当物和支付利息）。这还没有包括必须支付给比尔医生（医务帐单）的钱，是用于猩红热的疗养费，帐单他还没有寄过来。”他又继续写道，他认为每年 350 英镑够花了，尽管他前几年花了比这更多的钱。

将近 8 个月后马克思又告知他的朋友如下的家庭不愉快：“我近期发现……我每个星期给

我妻子的钱,她不够花,尽管开销没有增多。我上个月给她的钱,昨天就已经用完了,我就问她原因。原来是女人的愚蠢造成的。在债务表上,也就是她给我列的给你的那份单子上,她少报了 75 英镑。现在呢,她又要用家政的钱一点点地补上去。我问她为什么这样?她回答说她害怕说出那么大的总数目!女人显然总是需要管教的!……”

丝毫没有一点不信任的语调,恩格斯立刻回信,信中充满了令人感动的关心:“亲爱的黑人,不要因为 75 英镑就使你白了头。一等戈特弗里德付给我钱……我马上寄钱给你。”他同时警告说:“注意将来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了。你知道,我们预算得非常紧,不允许有附加的开支了。”

五十岁的马克思不仅要因为他的经济状况而受到恩格斯的警告,还要因为他那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为了有利于《资本论》第二卷,恩格斯虽然不想说服马克思戒烟戒酒或只是稍加控制(恩格斯自己也非常喜欢抽烟喝酒),但是他认

为,他的黑人至少应该运动运动,尤其是马克思经常抱怨疼痛、消化不良、胃痛、肝肿大。

“亲爱的黑人,换换空气和改变现有的生活方式是对你的肝最有效的方法。所以,马上就改,马上乘火车出门,8—14天后到我这里来。我已经安排了很多空余时间,我们可以一起跑好长一段路。然后你可以让古姆佩尔特给你检查和治疗……在短时间内你马上又能神采奕奕,精神充沛了。之后几星期的工作量要比你现在几个月的多得多……”

马克思拒绝了;他没时间。但几个月后他还在抱怨,这次是因为疼痛。恩格斯回信道:“我想说,你还是得明白,即使是为了你的第二卷,改变一下生活方式对你来说也是必要的。在这种不停的中断下,你永远都完成不了;若是能在自由的空气里多多运动,完成论著就是早晚的事情,自由的空气可以帮助你远离疾病。”

五十六岁时,马克思和他的小女儿图茜一起去了卡尔疗养地,他向他的“将军”汇报了这一旅行,失眠让他精疲力尽,但是“将军”安慰

他：“疗养一开始反而加重你的失眠，在我看来是由于不可避免的水的兴奋作用，这是正常的。”1874年9月18日，疗养的最后一天，马克思从卡尔疗养地写信给恩格斯：

“你知道我非常懒于写信；但它不是我这次一直沉默的原因。前三个星期几乎夜夜失眠；失眠和高度疲劳将为你解释一切。

尽管只是每天早晨喝水（晚上入睡前让人拿一杯特殊的冷矿泉进房），但却是一整天都在一种机器里，它一刻也不放过你。

每天早晨5点或5点半起床，然后接连喝6杯水，从不同的泉眼取水。这一杯与下一杯水至少要间隔15分钟。

然后是准备早餐，先买适合疗养食用的糕点饼干。接着是至少1小时的走路，终于可以喝咖啡了，这里的咖啡极好，在城外的一家咖啡馆里。然后步行穿越附近的山林；大约12点回到家，每天还洗个澡，又花去一个小时。

接着换衣整理；然后随便在一家饭店里吃午餐。

五十知天命

饭后睡觉是严格禁止的（饭前是允许的）……于是再一次出游，有时坐车出去，晚上6点到8点回到卡尔疗养地，简单的晚餐，然后上床。晚上有时会看戏（和其它的娱乐项目一样总是在9点结束）或听音乐会、朗诵会。

由于水的作用头脑在这儿极易兴奋……”

总的来说，马克思感觉卡尔疗养地的疗养对他非常有利。他在给恩格斯的报道末尾写道：“到目前为止我减了4磅，可以自己用手感觉到肝肿块在逐渐消失。我想，我终于在卡尔疗养地实现了我的目标，至少又可以工作一年……”

第二年，第三年，马克思又来到了卡尔疗养地。然后，1877年，和他病得厉害的妻子去了诺恩那，紧接着又去了黑森林。那时他已经快六十岁了。《资本论》第二卷还是没有完成。由于他的健康逐渐走下坡路，马克思在后来的5年里也没能够完成他的著作。第二卷在他逝世后两年1885年出版，恩格斯整理了他的遗著。他比他的“黑人”多活了12年。



拿破仑·波拿巴

Napoleon Bonaparte

1769—1821

“永远明澈，永远清醒和决断，每时每刻都能拿出足够的精力，将他认为有利和必要的事立即付诸实施。他就是一个战神在大刀阔斧地前进，从战斗走向战斗，从胜利走向胜利。……”

战神的爱情

——拿破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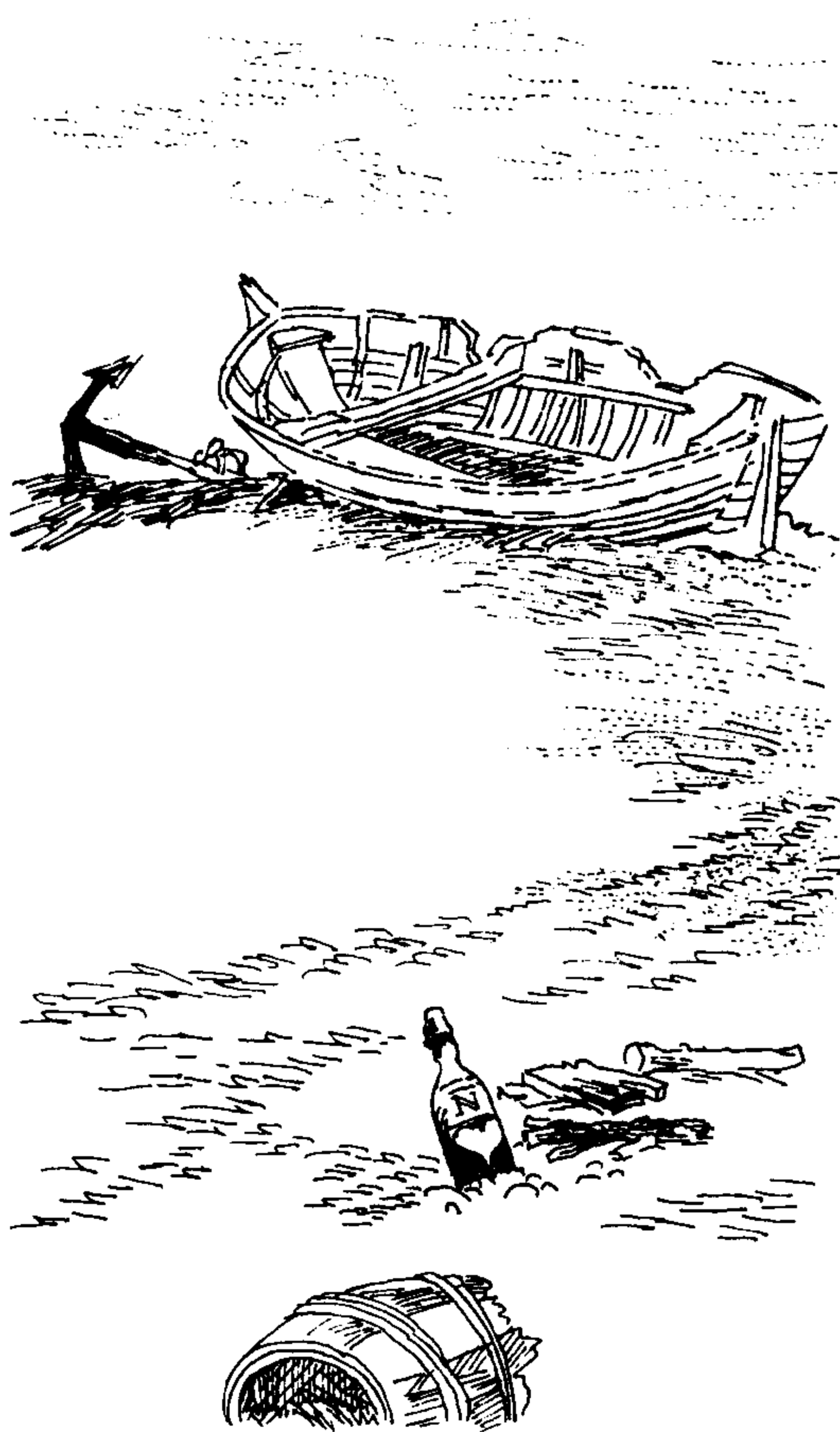
拿破仑·波拿巴：法兰西第一
帝国和百日王朝皇帝。称帝后颁布
《拿破仑法典》。

“是的，我的好朋友，人年轻才能成就伟业。”七十八岁的歌德在与艾克曼的一次谈话中论及拿破仑、人的创造性和天才问题时这么说（艾克曼记录于1828年3月11日）。上了年纪的歌德依旧对拿破仑怀有极为深刻的印象。关于这个二十七岁时就已经成了一个三千万之众民族偶像的拿破仑，歌德热情洋溢地渲染道：

“永远明澈，永远清醒和决断，每时每刻都能拿出足够的精力，将他认为有利和必要的事立即付诸实施。他就是一个战神在大刀阔斧地前进，从战斗走向战斗，从胜利走向胜利。完全可以说他是处于一种持续的明澈照亮的状态，这也是他的运程如此光彩照人的原因，前无古

人,也许还后无来者。是的,是的,我的好朋友,那是一个我们显然无法效仿的人!”

歌德说这番话时拿破仑已经死了将近7年了。他是作为囚犯1821年5月5日死在圣赫勒拿岛上的,还不到五十二岁。拿破仑生于1769年8月15日,当他度过五十岁生日时,他在那个湿冷的大西洋小岛上已经住了2年半了,由1780个士兵、500个军官看守着,两艘帆船不间断地在崎岖的海岸线巡逻,另外岛上还装备有500尊大炮。“所有的不幸中最糟糕的,”他说,“——这也是我永远不会习惯的——是和我妻子与儿子的分离。”当时他已饱受胃疼的折磨,后来诊断出是癌症。更让他痛苦的是,他认识到他输了这场游戏,并且是彻底输了。自愿跟着拿破仑来到这个岛上,在日记里记录了许多拿破仑的叙述的年轻的拉斯卡斯伯爵,怀着对过去的皇帝永远不变的崇敬之情,给世界上那些有影响力的大人物写信,恳请他们出力改善拿破仑的囚禁环境,结果都没有下文。拉斯卡斯伯爵也给奥地利皇帝,即拿破仑的岳父写了信:



“请陛下聆听：我所为之请求的，曾经是您的兄弟，后来您让他作了您的儿子；我在信中附上一些真实的资料，先生，我的希望和歉意与陛下您受到全世界认可的崇高的美德连在一起；人们把您称作最正直的、最人道的和最有宗教精神的君主，然而——有人正是以陛下您的名义往死里折磨他，那个您将亲爱的女儿嫁给了他，那个宗教使他成了您的儿子的人。

陛下！您会颤抖，因为有一天有人会把他那血迹斑斑的衬衣带给您。——那将会是审判的日子，国王们将要和所有其他人一起站到永恒之法官面前，而您将会面对这样问题：你是怎么对待你的儿子的？他现在结局又怎样？你为什么让妻子与丈夫分离？你怎么能够解开以我的名义缠绕起来的结？我把胜利授予我想给的人——我要惩罚那些滥用胜利的人，那些嘲弄我的永恒法则的人。

陛下！我不说了——我已经说得太多了吗？请陛下原谅我：这是我不能沉默的情感，它是我的呼喊，因为他们谋杀我的主人而逼迫我喊出

来。这是发生在我眼前的谋杀。我抱住您的双膝,我失去控制了,我祈求您为他做点什么……我呼吁帮助,因为一场谋杀正在发生。——哦!请您不要对我不理不睬。”

弗兰茨二世,比他的女婿拿破仑只大了一岁的奥地利国王,不大可能读到过这封信。不管怎么说,他没有为拿破仑,法国过去的皇帝出力。他的女儿玛丽·路易丝,同样也没有做什么。9年前她与拿破仑结婚并为他生下一子。他儿子成了“罗马的国王”和如今的“直辖市大公”。在拿破仑五十岁时,她又生下一子;这是她的第三个孩子,是这位法国前皇后与其在帕尔马共同生活了很久的那个人的第二个孩子。而拿破仑看来从来都不知道这件事。临终前不久,他说了他的心愿,即在他死后掏出他的心,把它存放在葡萄酒里,让人带给他在帕尔马的忠诚的妻子。当奥地利首相梅特尼希听说了这件事以后,立刻在拿破仑死后参与到这件事中,让玛丽·路易丝求助于她的父亲。玛丽·路易丝写信给维也纳的皇帝说:“我惟一的心愿是希望人们终于可

以让这个可怜的死者的灵魂安静下来，他的心脏也能够保留在墓穴里。不然，这会成为所有存心不良者的一个借口，前往帕尔马进行朝圣，而我处在这个位置实在是非常不舒服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只希望得到安宁与和平。”

对这个回答梅特尼希可以满意了。整个欧洲也满意了。



巴勃罗·毕加索

Pablo Picasso

1881—1973

……他一而再地画她，
并且又重新振作起来；低沉
压抑的时期过去了，从 1932
年春天开始，他的创作中有
一种幸福感扑面而来。

天才的第二次青春期

——毕加索

巴勃罗·毕加索：西班牙画家，雕刻家，立体主义画派主要代表，对 20 世纪现代艺术的发展作出非凡贡献。代表作有油画《格尔尼卡》、《亚威农的少女》、宣传画《和平鸽》等。

巴勃罗·毕加索，这个 20 世纪最重要的画家，毫无疑问地属于歌德提到的那些经历了第二次青春期的天才人物。毕加索于 1881 年 10 月 5 日出生于西班牙南部的马拉加。在五十岁时，毕加索经历了一次年轻转化。那个时候他最重要的一幅画《耶稣受难像》已经问世。这是一个表现绞刑的画面，是画在木板上的油画，一幅相对来说比较小的画。他从事这一主题的绘画已经有较长时间，多张草图可以证实这一点。但是批评家却把这幅画与同一时代，即产生于

1930年至1931年间的另一些作品一起，阐释为精神低谷的一种表现；《耶稣受难像》被视为介于“奥尔迦和玛丽·特蕾瑟时期的一个忧郁之点”。

奥尔迦·柯克洛娃是他的第一任妻子；但五十岁的毕加索离开了她，投向了年轻的玛丽·特蕾瑟的怀抱。在这段时间里他一而再地画她，并且又重新振作起来；低沉压抑的时期过去了，从1932年春天开始，他的创作中有一种幸福感扑面而来。那时正值世界经济危机，全世界有许多人，尤其是艺术家，在当时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日子。但是毕加索此时已经挣了许多钱，他用他的一部分财富购买了建于17或18世纪的布瓦热卢宫。这座宫殿坐落在巴黎附近，在一个名为维克辛的小村庄的边上。这座在经济危机的高峰时期以低廉的价格购买下来的房产，占地大约6摩尔干（欧洲土地面积单位。1摩尔干约等于0.25-0.34公顷），有一个年代久远的小教堂，还包括一系列的附属建筑物、马厩牛栏以及一间马车夫房。但是不久，当五十三岁的毕加索与奥尔迦离

婚时(他和她一起有一个儿子保罗),他不得不把这一切都拱手留给奥尔迦,以保全他的图画。

毕加索五十五岁时,创作了他最具代表性的画,《格尔尼卡》,把1937年4月26日这一残酷的时刻定格成永恒。那一天德国轰炸机摧毁了巴斯克人的小城格尔尼卡,杀死了1654个居民,88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儿童和老人。这幅画是对暴力、野蛮、屠杀的控诉,是对弗朗哥和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包括对战争和压迫的控诉。毕加索把这幅画馈赠给了西班牙人民。在他死后很长时间以后这幅画才被送到马德里。在此之前,毕加索把这幅画借给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展出。1939年在那里举行了“毕加索——40年艺术作品展”,它是当年美国12个毕加索展览中最重要的一个。

毕加索在他生命的第六个十年里极为成功、极富创造力。而且他继续保持了这一势头。他又多次坠入爱河,有时还与两个女人生活在一起,生儿育女,七十一岁时还又结了一次婚。



康拉德·阿登纳

Konrad Adenauer

1876—1967

“当我还是市长时，当然，我努力能再次当选市长一职……而在我退休之后，我希望能成为大学里的名誉教授，这样就能和年轻人在一起；不是正式的教授，那样工作就太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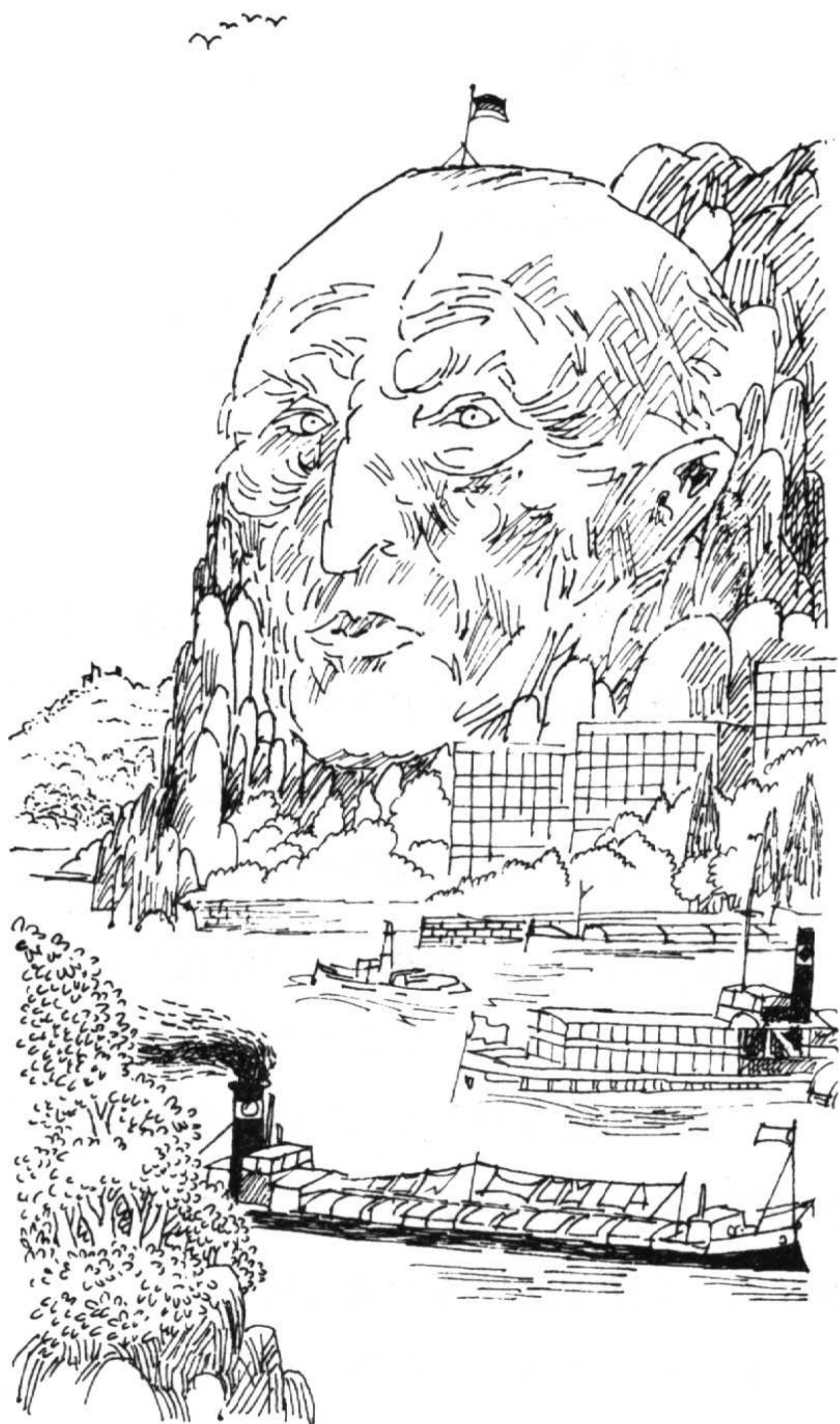
年龄最大的政府领袖

——阿登纳

康拉德·阿登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1949—1963)，基督教民主联盟创建人和主席(1946—1966)。

1926年1月5日康拉德·阿登纳五十岁了。这个科隆人在他三十岁读完法律后成了科隆市的副市长。11年后他被任命为科隆市长；整个德意志帝国内最年轻的市长。30年后他成了联邦德国的第一任总理，是当时世界上年龄最大的国家政府领袖。丘吉尔称他为俾斯麦以来最有远见的德国领导人。许多人甚至认为，要将德国历史倒翻到比俾斯麦更久远的年代，才能找到一个像他这样伟大的人物。

阿登纳五十岁时已经第二次被论及要当选德国总理。1926年5月为了几次谈判他必须去柏林。然而阿登纳提出了一些要求后来没有被



采纳。例如他希望根据与党派商谈结果自己选择他的部长们。作为政府首脑,为了能拥有一个可靠的基石,他坚持主张由社民党、中心党(他是该党的领袖之一)、德国民主党派和德国人民党派组成一个大联盟。但是这最终没有成功;有足够多的力量反对阿登纳当联邦总理。

他自己也决不是一定要得到这个职位;在当时,在魏玛共和国,总理被视为“弹射座椅”。五十岁的阿登纳很清楚地知道,他作为科隆市长的职务比联邦总理更稳当。虽然他12年之久的公职任期还有三年就要到头。但是,他再次当选的机会非常有利。因为科隆市长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他被视为“莱茵地区的国王”。科隆有65万居民,是普鲁士第二大城市。另外,自1920年以来阿登纳也是普鲁士参议院主席。许多年后,当从联邦总理退位以后,在将近九十岁的时候,谈到自己五十岁时的目标和理想时他这样写道:

“一个较好的中等阶层的位置——在乡村作公证员,四周是自然怀抱,把孩子抚养长大,

使他们成为有用的人,这就是我当时的理想。事实和我想象得不一样。但是向上爬的心思我从来都没有。当我还是市长时,当然,我努力能再次当选市长一职……而在我退休之后,我希望能成为大学里的名誉教授,这样就能和年轻人在一起;不是正式的教授,那样工作就太多了。”

当时,1926年,阿登纳已经结过第二次婚。他的第一任妻子在她生出第三个孩子后没有恢复健康,才三十七岁就去世了。阿登纳五十岁时,他的第二次婚姻所生的孩子一个三岁,另一个一岁。在这5个孩子之后紧接着又有两个孩子出世。年过五十的阿登纳有了一个相当大的家庭。也出于这个原因他对是否要用市长的职位去换取不稳定的联邦总理的宝座感到犹豫,尤其是他已经在科隆成功地争来了一个很高的收入。每年42000马克的年薪使阿登纳成了德国市长中年薪最高的一位。他还想努力获得更多的钱。当他1929年再次当选时,——只以一票胜出,正如日后他胜选总理时一样——他的年收入为8万马克。这比他当联邦总理(只有

55000)拿的钱多得多。这说明他能够很好地推销自己。他早就认识到了在自由经济下他还可能挣更多的钱;有人曾用20万马克的高价聘请过他。

阿登纳生命的第六个十年开始得十分顺利,但结束得不太美好。纳粹分子掌权后,当时阿登纳五十七岁,他立即被驱逐出办公大楼,驱逐出他的房子。他的银行帐户被冻结,政府拒绝支付他退休金。阿登纳在玛利亚·拉赫修道院里几乎住了一年之久。之后他和他的家庭搬到了波茨坦附近的新巴贝尔贝格,在那里他租到了一个房子,靠卖有价证券、油画和他妻子被偷首饰的保险金支持家用。在快六十岁时他又搬到了莱茵河旁,即累恩多夫。

从六十岁开始,他的情况又逐渐好起来了,无论如何在经济上如此。从那时候起他每月得到1000德国马克的退休金。在累恩多夫,他购置了一块6000平米的山坡地,在上面建了自己的家。即使在他快七十岁时,阿登纳觉得自己还很年轻。二战结束,纳粹倒台后,他再次被任命

为科隆市市长。同年,就像过去的那次一样,他又被人从办公大楼,甚至从科隆市里驱赶出来,而这次是被英国人。他们甚至禁止他以后再次从政。他自己从来没有把这一禁令放在心上。七十岁的阿登纳成了由他参与成立的英占区基民党的主席。七十三岁,俾斯麦在这个岁数已抱怨过多次,认为公务损害了他的身体,并很快之后结束了职务;而对阿登纳来说一切才刚刚开始:他接受了联邦总理之职,一直到八十一岁才退休。到八十三岁他还一直担任他所在党派的主席。

阿登纳 1967 年 4 月 19 日以九十一高龄在累恩多夫的家中逝世。他看来从来没想过衰老,无论如何没有想过他自己的。但显然想到过别人的! 当他的党内朋友想把他从总理宝座上挤下来而推荐经济学家路德维希·艾哈特作为接班人时,阿登纳完全不赞成。他试图说服他的经济部长继续做他以前的工作。他陈述理由道,如果艾哈特离开被他管理得井井有条的部门,天知道有谁能当这个经济部长。当艾哈特建议由

他的国务部长韦斯特里克来当经济部长时,阿登纳的反应是——如他在回忆录中所写——“我提醒他不要忘了,韦斯特里克马上就要六十五岁了!”而阿登纳自己却已经八十七岁了!他希望继续作联邦总理或成为联邦总统。他反对的不仅仅是六十五岁的韦斯特里克,同时,主要的还是六十六岁的艾哈特。这个八十七岁的人认为,那个比他小整整 20 岁之多的艾哈特做接班人已经太老了。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	
正文	